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授课教师**余博闻 副教授（[bowenyu@fudan.edu.cn](mailto:bowenyu@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位与价值 5](#_Toc195715472)

[一、回顾国际关系学 5](#_Toc195715473)

[（一）国际关系与生活 5](#_Toc195715474)

[（二）国际关系学主要问题 5](#_Toc195715475)

[二、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 5](#_Toc195715476)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与功能 6](#_Toc195715477)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 6](#_Toc195715478)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 6](#_Toc195715479)

[（三）如何开展理论分析 7](#_Toc195715480)

[（四）如何评价理论 7](#_Toc195715481)

[（五）理论分析之外 7](#_Toc195715482)

[第二讲 古典文献 8](#_Toc195715483)

[一、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8](#_Toc195715484)

[（一）历史背景 8](#_Toc195715485)

[（二）斯巴达辩论与战争的原因 9](#_Toc195715486)

[（三）米洛斯对话：正义v. s.强权 9](#_Toc195715487)

[（四）为什么国际关系学应当停止误用“修昔底德陷阱” 10](#_Toc195715488)

[二、马基雅维利与权力政治理论 10](#_Toc195715489)

[（一）《君主论》中的人性论 10](#_Toc195715490)

[（二）《君主论》中的治国方略 10](#_Toc195715491)

[（三）马基雅维利理论中的“美德”“命运”“必需” 11](#_Toc195715492)

[三、霍布斯论自然状态和利维坦 12](#_Toc195715493)

[（一）人性、环境与自然状态 12](#_Toc195715494)

[（二）利维坦诞生的必然性 13](#_Toc195715495)

[（三）霍布斯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13](#_Toc195715496)

[四、康德与永久和平论 13](#_Toc195715497)

[（一）《永久和平方案》 13](#_Toc195715498)

[（二）迈向永久和平的终极机制 13](#_Toc195715499)

[（三）康德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14](#_Toc195715500)

[第三讲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发展的“大辩论”和“范式演进”叙事 14](#_Toc195715501)

[一、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 14](#_Toc195715502)

[（一）理想主义产生的背景 14](#_Toc195715503)

[（二）理想主义的要义 14](#_Toc195715504)

[二、卡尔与《二十年危机》 16](#_Toc195715505)

[（一）卡尔对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16](#_Toc195715506)

[（二）卡尔的国际政治观 16](#_Toc195715507)

[三、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和外交方略 17](#_Toc195715508)

[（一）汉斯·摩根索与现实主义六原则 17](#_Toc195715509)

[（二）汉斯·摩根索论国家行为和均势 17](#_Toc195715510)

[（三）汉斯·摩根索论外交方略 18](#_Toc195715511)

[四、国关理论发展的“大辩论”和“范式更替”叙事 18](#_Toc195715512)

[（一）“大辩论”叙事概览 18](#_Toc195715513)

[（二）“大辩论”的价值 19](#_Toc195715514)

[（三）反对“大辩论”叙事的理由 19](#_Toc195715515)

[（四）关于范式（paradigm） 19](#_Toc195715516)

[第四讲 分析层次、世界体系与系统效应 20](#_Toc195715517)

[一、层次分析概述 20](#_Toc195715518)

[（一）个人、国家、体系 20](#_Toc195715519)

[（二）层次分析总结 20](#_Toc195715520)

[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 21](#_Toc195715521)

[（一）基础性假设 22](#_Toc195715522)

[（二）帝国主义理论 22](#_Toc195715523)

[（三）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 22](#_Toc195715524)

[（四）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 23](#_Toc195715525)

[（五）对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的评述 23](#_Toc195715526)

[三、系统效应 24](#_Toc195715527)

[（一）系统不同于（未必大于）部分之和 24](#_Toc195715528)

[（二）系统效应的概念 24](#_Toc195715529)

[（三）基于系统效应的建议 24](#_Toc195715530)

[第五讲 新现实主义 25](#_Toc195715531)

[一、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25](#_Toc195715532)

[（一）追求科学的理论 25](#_Toc195715533)

[（二）一个体系理论 25](#_Toc195715534)

[（三）体系压力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25](#_Toc195715535)

[（四）结构（即权力分布）的核心地位 26](#_Toc195715536)

[（五）极和理论 26](#_Toc195715537)

[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27](#_Toc195715538)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设 27](#_Toc195715539)

[（二）国家行为 27](#_Toc195715540)

[（三）霸权 27](#_Toc195715541)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均势 28](#_Toc195715542)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 28](#_Toc195715543)

[（一）理论要点 28](#_Toc195715544)

[（二）理论应用 29](#_Toc195715545)

[第六讲 复合相互依赖和新自由制度主义 29](#_Toc195715546)

[一、从相互依赖到复合相互依赖 29](#_Toc195715547)

[（一）相互依赖 29](#_Toc195715548)

[（二）对国际体系的新认识：复合相互依赖 30](#_Toc195715549)

[（三）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命题 30](#_Toc195715550)

[（四）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作用机制 31](#_Toc195715551)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31](#_Toc195715552)

[（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假定 31](#_Toc195715553)

[（二）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障碍 31](#_Toc195715554)

[（三）合作的进化 32](#_Toc195715555)

[（四）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 32](#_Toc195715556)

[（五）国际制度的产生 32](#_Toc195715557)

[三、“新-新辩论”的焦点 33](#_Toc195715558)

[四、国际制度研究议程 33](#_Toc195715559)

[第七讲 理性选择与威慑 33](#_Toc195715560)

[一、理性选择路径的前提假设 33](#_Toc195715561)

[二、博弈论与国际关系 34](#_Toc195715562)

[（一）博弈论简介 34](#_Toc195715563)

[（二）博弈分析 34](#_Toc195715564)

[（三）纳什均衡及其解法 34](#_Toc195715565)

[三、费伦和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 35](#_Toc195715566)

[（一）从传统理论到谈判模型 35](#_Toc195715567)

[（二）谈判的可能性 36](#_Toc195715568)

[（三）谈判失败的情况 38](#_Toc195715569)

[四、威慑理论 38](#_Toc195715570)

[（一）威慑的定义 38](#_Toc195715571)

[（二）威慑成功的条件 39](#_Toc195715572)

[（三）建构可信性 39](#_Toc195715573)

[第八讲 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 39](#_Toc195715574)

[一、国内-国际路径综述 39](#_Toc195715575)

[（一）阿利森与《决策的本质》 39](#_Toc195715576)

[（二）国内-国际路径的共同基础 40](#_Toc195715577)

[（三）国内-国际路径的分歧 40](#_Toc195715578)

[二、国内利益集团与国家行为 40](#_Toc195715579)

[（一）早期的国内利益集团与国家行为讨论 41](#_Toc195715580)

[（二）利益集团影响国家行为的推论 41](#_Toc195715581)

[三、民主和平论 42](#_Toc195715582)

[（一）民主和平论的概念 42](#_Toc195715583)

[（二）民主导向和平的机制 42](#_Toc195715584)

[四、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 43](#_Toc195715585)

[（一）帕特南的“双层博弈” 43](#_Toc195715586)

[（二）合作与遵约 43](#_Toc195715587)

[第九讲 国际政治心理学 44](#_Toc195715588)

[一、早期论说：弗洛伊德论战争的原因 44](#_Toc195715589)

[二、认知偏差对理性选择的限制 44](#_Toc195715590)

[（一）认知偏差产生的机制 44](#_Toc195715591)

[（二）一些典型认知偏差 45](#_Toc195715592)

[（三）捷径/启发（heuristics） 45](#_Toc195715593)

[（四）个人特质与认知偏差 45](#_Toc195715594)

[（五）危机和压力 46](#_Toc195715595)

[三、前景理论与决策 46](#_Toc195715596)

[（一）前景理论的基本命题 46](#_Toc195715597)

[（二）前景理论与领导人决策 46](#_Toc195715598)

[（三）前景理论与领导人决策 47](#_Toc195715599)

[四、情绪和决策 47](#_Toc195715600)

[（一）情绪、认知与决策 47](#_Toc195715601)

[（二）情绪与威慑 47](#_Toc195715602)

[五、团体心理学与团体决策/行为 48](#_Toc195715603)

第一讲 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位与价值

2025.2.19

一、回顾国际关系学

（一）国际关系与生活

当代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将近二百年前，清朝被拉入了世界格局；如今，世界格局的每个细节依然与中国息息相关：中东的局势与美国全球战略的焦点紧密相连，进而影响美国针对中国的亚太战略；2000年代中期G20峰会上的决定影响了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也为之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个人的命运也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只要一个人要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不论是生活、旅行、求学、消费、工作，都与国家命运、人类命运紧密绑定。

总而言之，全球体系十分复杂，各部分相互影响，紧密相关；国际关系牵动着个人的命运；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是多元的，国家仍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但非国行为体家（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等）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关系不仅涉及大国的兴衰，还关乎制度、规范等“软件”的设计、建构与运行。

（二）国际关系学主要问题

国际关系是一门研究国际政治各行为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内行为体〔官僚、地方政府等〕、个人等）之间的互动的学科。具体地说，国际关系关注战争与和平、秩序与控制、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解释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创立的初衷，秩序与控制则是当代的热门话题。国际关系解释国家行为的范畴不只是战争与和平，还包括为何合作、遵守制度、遵守规范等，甚至国家国内变革与国家对外行为，国家对外行为与国内变革等；解释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则是上一点的延伸，但目前还尚未成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贯穿国际关系学的始终，是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大框架。

二、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

为了考察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我们不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选取疫情作为例子，是因为疫情甚至比战争更能调动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

如果运用现实主义框架，那么关注点就在于国家的反应。无政府状态、生存作为第一目标、权力零和博弈等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初期试图落井下石”“为什么存在疫苗民族主义”一类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疫苗制备能力并非顶尖、但依然要制造大量疫苗——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受制于人，即使是技术上或经济上不甚合理的决策，都会出于现实因素而作出。

如果运用制度主义框架，那么就同样关注国家的反应。国际体系的复合相互依赖既能促进合作，又具有脆弱性，例如新冠肺炎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问题；国际制度与国家间合作息息相关，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协调功能等。国家合作的限度也值得考虑。从制度主义视角来看，疫情封控的结束也是必然的，因为“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无法消弭。

除此之外，还有领导人特质因素（如疫情初期特朗普的决策风格）、国内因素（如国内利益集团在其中的利益）也可作为进一步的解释变量。

当然，上述因素以外，国际关系中还存在一些“软因素”，如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认知因素等。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与功能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

1. 理论，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是试图分析、解释或预测事物的一个命题或一组命题。因此，**国际关系理论**被定义为一套用于分析世界事件和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和指导方针。

理论是对现象的系统思考，旨在解释这些现象，并说明它们如何以一种有意义的模式相互关联，而不是不连贯的随机现象。总之，**理论**是一套命题和概念，旨在通过明确命题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现象。通俗来说，理论所揭示的就是“什么因素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什么结果”。

不同的科学哲学流派对“何为理论”的回答也有所不同。实证主义认为，理论是经过实证检验的假设系统，或通过实证观察得出的概括系统；科学实在论认为，理论解释了一般趋势，即由基本机制产生的变量之间反复出现的联系；规范主义认为，理论是对世界“应该如何”的想象；批判理论认为，理论批判了现有秩序，同时提供了变革和解放的视角。

2. 理论与规律的区别

规律是现象、行为或变量之间的固有关系——“如果A，那么就B。”例如，日出日落乃自然的规律。

理论不仅涉及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还涉及这些关系为何存在和重复。理论可以解释规律——例如，日出日落是因为地球的自转与公转而产生的。

规律是恒久、绝对而正确的，但理论并非如此。例如，“日出日落”是恒久正确的，但“地心说”“日心说”作为理论先后被证伪了。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包括：

* 理论定义重要问题；
* 理论指出哪些应为分析要点，为解释现象提供分析的捷径；
* 理论具有一定的洞察力；
* 理论提供一种看待现实的独特视角
* 理论为改变世界提供指南。

但是，理论就像地图或手册，无法涵盖所有细节，只是根据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来提供抽象的指南。某一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理论总是被假设和解释范围所限制。研究者要自行决定哪一（或哪些）理论在何种情境下提供了最优解。

理论的建构有两种途径：一是归纳（induction），二是演绎（deduction）。

国际关系理论的要素有：

* 如何理解人性？
* 如何理解国际体系的状态？国际体系对国际行为体行为有何影响？
* 如何理解国家（拟人化？复杂性？）？如何理解国家利益？
* 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有何影响？
* 哪些因素影响了领导人（或集团）的决策？个人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如何？
* 如何理解权力、制度与观念要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
* 如何理解变化（何为变化？变化的动力？）

（三）如何开展理论分析

开展理论分析的基本步骤如下：

* 决定研究的性质：一般性研究、普遍性研究；
* 对研究问题的充分认识：问题处于哪个层次？对细节如何取舍？既有的解释有何不足？
* 初步理论选择/建构：你对各种因素和基本过程的最佳猜测；可检验的假设；
* 验证你的理论解释：关联性是否存在？过程、机制是否存在？实证发现的普适性？
* 反思、修正、必要时重启：做好假设被推翻的准备。

（四）如何评价理论

评价理论的指标包括：

* 一致性；
* 广度与深度；
* 解释力；
* 未来发展的预期（预测）；
* 自我批判与竞争性理论比较；
* 洞见。

教授认为，“可证伪”性不必放在这里；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大多数体系理论都是坏理论。

（五）理论分析之外

除了理论分析之外，还有其他几种分析方法：

|  |  |  |
| --- | --- | --- |
| **分析方法** | **解释** | **案例** |
| 历史学叙述 | 为描述和/或研究单个或多个案例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在可获得信息和写作篇幅等客观约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追求尽可能详尽地还原现象发生的所有（重要的）细节。 | 加迪斯v.s.阿利森  保罗肯尼迪  修昔底德作为特殊案例 |
| 哲学分析 | 哲学分析从核心文本和分析性思维中提出理由；哲学方法可能无助于帮助我们回答具体问题，不会帮助我们制定或实施政策，但它们可能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提供规范性指导。 | 柏拉图  霍布斯  康德 |
| 批判性分析 | 批判性分析对主要概念进行解构，并利用话语分析进行深入描述。 | 女性主义、后现代  （广义上也可归为理论分析） |
| 相关性分析 | 相关性分析利用统计数据发现一般模式；有观点认为，数据和方法压倒了他们的研究实质；行为主义者忽视了许多基础性问题——人类和社会的本质，因为这些问题不容易用实证方法来检验。 | 关于“民主和平”的实证研究 |

第二讲 古典文献

2025.2.26

许多后世的人在引述古典文献时，往往只是引用一个“名”，对古典文献中的概念作粗浅的理解，生搬硬套——例如，“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就有待商榷。因此，阅读古典文献本身就显得很重要。

**阅读古典文献能获得启示。**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无不从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汲取营养。许多现代理论都是基于理论家对过去理论的一种解读（很多时候也是误读）。比如，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为现实主义提供基础，他们本身也得益于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康德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提供基础。国际关系学确实非常善于借鉴和重构概念和分析框架，以为国际政治分析服务。

**阅读古典文献能锻炼思维。**经典文献往往思想深邃复杂。越研读越能获得启示，越研究越能发现隐藏在逻辑和文本细节中的惊人之见。因此，解读本身可被视为一种思维操练，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纯粹的追求真知，非常有趣。

**阅读古典文献能增长知识。**从追求知识的角度，多读历史和经典也是有好处的，能够增加我们的人文底蕴。

1.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一）历史背景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受了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影响，但他更在意“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因果关系”，远远比希罗多德深刻；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除了史学意味外，更有一层政治哲学的意味。

修昔底德旨在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古希腊世界而言是以悲剧而结尾的；也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要目的在于反思战争。在这本书中，演说辞至关重要，占全书的1/4篇幅。

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修昔底德

但这不一定是正确的，修昔底德可能刻意使两边观点交锋，从而展示反思。这就是为什么这不是一般的历史书。

（二）斯巴达辩论与战争的原因

科林斯人演讲的主旨是将雅典描绘成傲慢、蛮横、侵略成性、追求无限扩张的国家；威胁（若斯巴达不予援助）将脱离斯巴达主导的同盟。

雅典人演讲中则有：

* **目的：**对斯巴达表达威慑；
* **要点一：**雅典帝国源自盟邦对雅典领导地位的拥戴和自愿接受；
* **要点二：**雅典的行为是自然和正常的，因为其遵从了人行为的三大动机——恐惧、荣誉心和私利欲望；
* **要点三：**任何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无论其霸权如何正当和温和，必然成为众怨所指；因而，假如斯巴达毁了雅典帝国，它也不会给其他国家自由，必将像雅典一样失去盟邦的好感；
* **要点四：**斯巴达应当三思而后行，战争有其难以预计性。

对斯巴达人内部辩论的常见解读（也是来自修昔底德的直接陈述）是：

斯巴达人所以表决确定和约已被撕毁和他们必须投入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被其盟友的论辩说服，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希腊的较大部分已在雅典人手里，害怕雅典人可能变得更加强大。

——修昔底德

这里就有“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不合理的一点：“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是崛起国导致了与守成国的战争；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却是守成国雅典发动了对崛起国斯巴达的战争。

总之，结合科林斯人的说辞，以及当时雅典军舰的四处出征，斯巴达就将其理解为了雅典的侵略，这一认知既已生成。

科林斯人对斯巴达改变政策起的作用可以被分成三方面：**第一，**他们组织和促成了一场有效的、由斯巴达的哀怨的朋友和盟邦掀起的宣传运动，那给了好战的斯巴达监督官们一个机会，来在最有利的环境中抛出自己的主战理由。**其次，**他们运用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即威胁脱离斯巴达同盟，那看来会引起该同盟的解体。我们可以将此威胁当作只是虚声恫吓，但大多数斯巴达人不愿拿它试试看。**然而，**科林斯人运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大概是他们给他们的斯巴达观众绘制的那幅雅典人画像。靠着将雅典帝国的早先历史与雅典最近对科尔基拉问题的回应绑在一起，他们能够将雅典人描绘成一种轻率躁动、咄咄逼人和危险无比的人民，它必须在为时过晚以前被制止。

——唐纳德·卡根

由此可见，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不能被简单解释为“权力转移”，而有着多重的原因。

（三）米洛斯对话：正义v. s.强权

米洛斯是一个反抗雅典侵略、最终招致灭亡的城邦。雅典人的理论中，有着权力政治的内核：

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面对雅典的侵略，米洛斯以正义予以驳斥；但在雅典的“自然之理”中，恐惧、荣誉、私利才是核心。然而，雅典帝国基于爱戴，因此雅典还是要在道义上找到正当性。

在米洛斯与雅典的争论之后，雅典就走上了下坡路。这印证了米洛斯对雅典的忠告：没有帝国可以靠强权永久维系；叛变是杀不尽的。总之，这其中体现了强权政治的限度，也体现了强权政治的悲剧——雅典帝国（甚至整个希腊文明）走向衰亡正是由于帝国抛弃了正义的传统，完全倒向了强权和扩张。

米洛斯必须被毁灭，因为米洛斯是雅典人理论的例外。

（四）为什么国际关系学应当停止误用“修昔底德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当代国际关系学解释为现实主义的“修昔底德陷阱”，但这本书的原意却是“纯粹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除了现实主义外还有正义与荣誉”。

国际关系学对修昔底德的借用包括：

* 关于人的三大动机的论断启发霍布斯和后来的IR学者；
* 从米洛斯对话中总结的权力政治逻辑；
* 从开战原因分析引出结构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论稳定与冲突（如吉尔平）。

其中被主流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忽视或曲解的智慧有：

* 雅典是崛起国？（回到“修昔底德陷阱”）
* 纯粹的文本借用v. s.修昔底德想要讲的智慧；
* 现实主义理论将导致悲剧的权力政治逻辑视为了正常的逻辑？
* 正义、传统、话语的重要性？
* 荣誉的重要性？
* 傲慢、误判、自我实现的预言与战争。

二、马基雅维利与权力政治理论

（一）《君主论》中的人性论

《君主论》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恶”。

如果天下皆君子，这种劝诫就不是忠言了，但世人奸诈，不会对你守信用，所以你也不必充当君子。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君主论》中给予“人性恶”而提出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也对后续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基础。

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至诸脑后，那明天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自我毁灭。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二）《君主论》中的治国方略

《君主论》指出，国君之责任在于为国家谋利益、谋生存，如同狮子与狐狸一般，综合运用力量与欺骗。军事力量至关重要：

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和声誉了。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君主可以为了利益违背道德（如欺骗）。做一个“出色的伪君子”。

让人畏惧以及不招人怨恨，这两者是可以很好地并存的。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人们爱戴君主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畏惧君主则是出于对方的意愿。英明的君主应该把统治建立在自己的意愿上，而不是以其他人的意志为转移。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三）马基雅维利理论中的“美德”“命运”“必需”

马基雅维利作为个人道德高尚的代表，为何要在治国理政上提出如此不符个人道德的方针？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割据势力十分严重，各城邦国家间的彼此仇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备受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蹂躏。马基亚维利主张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结束意大利的分立状态。

1494年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国。1498年马基亚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会见过许多执掌政权的人物，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亚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509年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的矛盾中，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但当他1511年前往比萨时，教皇的军队攻陷佛罗伦萨，废黜执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控制佛罗伦萨。马基亚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与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

面对四分五裂、战乱不止的意大利，依凭个人道德显然是没有出路的。马基雅维利于是提出了他理论中的美德（Virtù）、命运（Fortuna）、必需（Necessità）。

“美德”包含着公民的德行与统治阶级的德行；它既意味着一个人随时为公益作奉献的准备，也意味着国家伟大创立者和统治者的智慧、精力和抱负。不过，马基雅维利将一国的创立者和统治者所必须具有的“美德”算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德”。如果君主按照基督教的个人美德行事，是对整个国家的不负责。

他确信，即使是共和国，若无伟大的统治者、组织者个人襄助，也无法问世。因而，在此限度内，他的共和理想含有君主主义倾向。

“命运”是恶毒的，“美德”在别无他法时，也必须恶毒。这很明白地表达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真正精神来源，那就是如下声名狼藉的信条：在国家的行为中，甚至肮脏的手段也是有理的，只要关系到赢得或维持国家所必须的权势。

说《君主论》就其技巧性的各章而言，很容易使人感到马基雅维利只是在密切关注君主的个人利益。但如果将这一作品同《论李维》和他的其他著述一起拿来当作一个整体看待，那么这种印象就完全消失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真正的中心思想，那就是凭借一位专制君主的“美德”，凭借“必需”所规定的一切措施的杠杆力，来实现一个沦落了的民族的新生。

当问题在于拯救祖国时，一个人不应当有丝毫迟疑去考虑某事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是文雅的还是残酷的，是值得赞美的还是可耻的。相反，他应当抛开一切别的想法，把无论何种将拯救国家生命和维持其自由的决心坚决贯彻到底。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三、霍布斯论自然状态和利维坦

在1649年，英国人结束了自1642年由处决国王并宣告英国为共和国而开始的内战，仍在巴黎流亡的霍布斯感到他必须回应一系列革命性事件，所以他停下手头工作，着手写作《利维坦》。该书出版于1651年，就在霍布斯返回英国前不久。

（一）人性、环境与自然状态

《利维坦》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的演说为主的文本，以及《君主论》这样教条为主的文本都不同，它是以严密的演绎推理为主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能力的平等性。

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第二，欲望的平等性。

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第三，资源的有限性加上平等的欲望，就导致了竞争与疑惧。

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他们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由于人们这样互相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能够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第四，对荣誉的追求。

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他的评价和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相同。每当他遇到轻视或被过低评价时，他自然就会敢于力图尽自己的胆量加害于人（在没有公共权力使大家平安相处的地方，这足以使他们彼此摧毁），强迫轻视者对他做较高的评价，并且以杀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同样的东西。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根据这一切，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就处于所谓自然状态，也就是战争状态下。

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战争不仅存在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时期……正如同恶劣气候的性质不在于一两阵暴雨，而在于一连许多天里下雨的倾向那样，战争的性质也不在于实际的战斗，而在于整个没有和平保障的时期里人所共知的战斗意图。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下，任何中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将不存在。

（二）利维坦诞生的必然性

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还有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

利维坦通过支配社会，剥夺人的自由来给予安全。

（三）霍布斯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在国际关系中，“自然状态”被广为引用，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概念化；其对人性的理解也被广为引用。但霍布斯对人性和自然状态的理解远远比结构现实主义所呈现的更复杂。

霍布斯所推理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显然不是平等的。此外，国家也不像个人那样脆弱，因而恐惧不会那么大，从而国家很可能不会放弃权利，而是加强权力；所以，世界政府就不大可能存在。

四、康德与永久和平论

（一）《永久和平方案》

康德《永久和平方案》之要点，就在于设想根本超越国际无政府与其固有的“战争状态”效应，办法是皆为自由主义性质的国内政治改造和国际体制构建。康德认为，共和政体是自由、平等、所有人服从法律的政体；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共和政体的国际延伸。

这里，必须留意“共和制”和“民主制”在此特定语境中的含义。康德，就像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一样，认为在民主制中人民自己行使执行权（executive power），因此人民永远是自己的事情的法官，显然，这是不合理的。根据当时的通行理解，共和制是指立法权和执行权彼此分离（不管执行权是转交给一个人还是许多人）政体，它实质上是今天所习用的“代议民主制”。简单来说，“共和制”指的是权力制衡，而“民主制”指的是多数统治。

（二）迈向永久和平的终极机制

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看似是一个“一步到位”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在实际上，这一方案也有其现实意义，也并非当下就能实现，需要社会的演化（evolution）。

康德的激进主义，就在于设想根本超越国际无政府与其固有的“战争状态”效应，办法是皆为自由主义性质的国内政治改造和国际体制构建。然而，对于实现这一超越，康德的终极信心或真正希望何在？说到底，那不在于共和制度的普遍化，甚至也不在于抽象的理性，因为康德对现实主义者们描绘和确信的悲观图景完全承认，完全理解，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个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大为不同的悲观主义者。必须从他的《世界史》（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来看问题：他的终极信心或真正希望在于世界史的逐渐演进，尽管是很大程度上不可知的演进。“自然设计与人的道德义务命令的趋同——那从它们之间的冲突当中兴起的趋同，是在他的《世界史》中得到阐说的那种新颖的历史概念的本质，据此历史是朝着一个目的的分阶段发展的逐步演进。”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不那么是一位自由制度主义者，他超出了本质上没有历史哲学的自由主义。

——时殷弘《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原稿）》

在康德的道德观中，人不会理所当然地“变好”，但他们都有从经验中获取教训、进行适应的能力。因此，永久和平的进程，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进步。从这一点可以推出，之所以不要常备军，是为了“全民上战场”，通过战争的苦痛经验来总结出和平的重要性。

（三）康德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从表面上来看，康德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所称的“自由和平论”）。但是，如果考虑到康德关于社会演进的论点，那么康德更是建构主义的基础（关键在于社会的演进）。

第三讲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发展的“大辩论”和“范式演进”叙事

2025.3.5

一、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

（一）理想主义产生的背景

从时间顺序上来说，理想主义可谓“第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的产生背景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背景基本一致，都是在一战后为了理解、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出现的。

国际关系的兴起源于一场灾难性的大战；支配和激励这门新科学的先驱们的压倒性目标是避免国际政治体制的这一**疾病**再次发生。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一战带来了巨大的消耗与杀伤，以及“没有意义的牺牲”，暴露了欧洲传统权力平衡游戏的缺陷，未能维护和平。

（二）理想主义的要义

1.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1.废除秘密外交；2.航行自由；3.自由贸易；4.国际裁军；5.协调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利益；6-13.具体政治安排；14.成立国联。

威尔逊宣告，美国的参战目的“是在世界生活中确立正义与和平的原则，反对自私和专制的强权，是在世界真正自由和自治的民族中间确立目的和行动的一种协调，它将从此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这些原则总的来说，在于从一套与传统的欧洲权势政治观相反的国际关系理念出发，要求废止传统的国际政治运行模式，改行实际上体现美利坚民族特殊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体系（说到底还有其特殊利益抱负）的新规范和新机制，以此实现从未被欧洲列强当作政策目的的普遍持久和平。

威尔逊主义致力于寻找消除战争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

* 消除国家冲突的领域和战争的能力；
* 促进民主与自决；
* 依赖大众舆论和启蒙来弘扬正义、自由；
* 以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替代均势。

从十四点计划的第1、5条可见，威尔逊强调战争起因于专制制度，因为据称只有在这类制度下，一小撮统治者或特权阶层才能肆意为自己的狭隘私利发动战争，驱使民众充当炮灰。在威尔逊那里，普遍持久和平首先有赖于普遍确立民主制度，使据认为生性热爱和平的大众主宰国家对外政策。在他现实政策中，这就体现为不愿和俄国结盟、要求德皇退位等。

从十四点计划的第2、3、4条可见，威尔逊认为国家利益可以调和。普遍持久和平还有赖于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关系，其必要条件包括公海绝对自由和尽可能消除一切歧视性贸易安排和其他经济壁垒。

从十四点计划的第14条可见，威尔逊认为可以限制国家。

但是，这十四条的提出并没有达成其预期。这些条款只描绘了应然的国际社会状态，缺乏对达成理想状态所必须的政治机制的分析和认识。

2. 米特兰尼的功能主义

传统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于1943年出版《有效的和平制度》一书，提出功能主义方法。简单来说，功能主义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废除国家的存在”。功能主义主张从“低政治”的维度（如体育、科研等）做起，通过这些方面的合作，逐渐拆解国家功能，形成新的跨国网络，最终废除国家，实现和平。在功能主义的愿景中，个人最终是忠诚于跨国网络而非国家的。

传统功能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仅从“低政治”的领域出发，而没有考虑“高政治”的领域；并且，那些“低政治”的领域，实际上还是具有政治化的；这些方面的合作也涉及资源分配，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国家的政治功能。

新功能主义对传统功能主义作了修正和完善。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提出，对政治性与功能性作绝对的截然划分是不对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是难以分割的”，“经济与政治、政治家和专家的截然区分并不存在，因为技术化的决策基于一个先行的政治性决定”。

由此，新功能主义对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向政治性领域作了相对的区分，认为两者既具有适度的分离，又有内在的联系，从而奠定了从功能性领域向政治性领域扩溢（spillover）的基础。

“扩溢”指的是，不同领域的合作具有潜在的关联性，任何领域合作的成功都会增强在其它领域进行合作的愿望与信心。

政治统合是一个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几个处在不同国家环境中的政治行为体被说服将其忠诚、期望与政治行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该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拥有对现有民族国家的管辖权。

——厄恩斯特·哈斯

3. 理想主义论点总结

理想主义对人性的预期是相对乐观的，认为人性是理性、可以进步的，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改善而变好。

理想主义认为民族自决会导向民意下的民主；国家间的利益是可调和的。冲突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舆论可以促进国家间和平的合作，从而构建和平的世界；国际和平应当依托集体安全体系。

理想主义之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完全和平正义的世界秩序，相信觉醒后的民主主义意识将产生巨大影响，相信国际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呼应，相信国联一定能够发展和成功，相信进步人土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能够奏效；理想主义者坚信自已作为国际关系学者的职责，是消除愚味和偏见，揭示通往和平安宁之路”。

——王逸舟

二、卡尔与《二十年危机》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是外交官，1919年作为英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巴黎和会，后来又在英国外交部工作；1936年，他任教威尔士大学。卡尔是一名历史学家，这是他的主业。1939年，他撰写了《二十年危机》，不久之后就爆发了二战。

（一）卡尔对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卡尔认为，理想主义以“应然研究”代替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导致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理想主义将“道德”绝对化，但个人尺度的道德与国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国家追求本国利益可能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可能做出按个人道德标准违反道德的事；理想主义过度强调国家利益和谐论，但实际上国家利益是相冲突的；理想主义片面强调国际法、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的作用。

（二）卡尔的国际政治观

卡尔的国际政治观以权力为核心。他的观点以命题为主，给出世界观，多数是基于历史洞见而非假设；缺乏解释和推理。

卡尔认为，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成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三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卡尔受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决定意识”的思维方式影响，认为国际政治现象可用权力进行解释，所谓的利益和谐论不过是反映了现状国的利益。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权力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

卡尔认为，权力与道德是政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两者相互影响，当然权力起决定作用。

在战争与和平的原因的问题上，卡尔强调权力的制约。他认为战争与和平是背后是维持现状国家与改变现状国家的权力斗争；维持现状国家权力占优则和平，改变现状国家权力占优则战争。因此，在一战后的二十年之间，关键不是改造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而是以权力制衡防止那些国家东山再起。

三、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和外交方略

（一）汉斯·摩根索与现实主义六原则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是：

1. 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2. 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是由权力界定的利益；
3. 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但特定的利益观念并非一成不变；
4. 不能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来评价国家的行为；
5. 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德愿望上升为普天下适用的道德法则；
6. 现实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策对国家权力有何影响。

对于第1点，摩根索认为，人性本能是追求权力（自私自利，并非邪恶，而是与霍布斯差不多），国家是人的放大。在研究方法层面，这一点意味着，社会的客观规律不能轻易改变，我们要做的是顺应规律。

对于第2点，摩根索认为，权力是手段，也是目的。政治领域中，当谈到对利益的追求时，实际指的是对“权力”的追求。这与用财富界定利益的经济学等学科有本质的不同。

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汉斯·摩根索

对于第3点，摩根索认为，国家行为逻辑统一于追求权力，从而可以分析历史，可以比较分析。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利益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

——汉斯·摩根索

摩根索的第4点原则是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那里获得启发的。对于第5点，摩根索认为，所有国家在诱惑下都会用“适用于全世界的道德目标来掩饰它们自己的特殊愿望和行动”——这就像十字军东征式的狂热，以“道德原则、理想或上帝”之名，实际毁灭了众多的民族和文明，这在道德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要防止以道德之名推行民族主义。

摩根索比卡尔有更严谨的推理逻辑，但摩根索也并未区分国家和个人层次，简单基于人性推论国家行为逻辑。在摩根索的理论中，国际体系的意义也不清楚（或至少未被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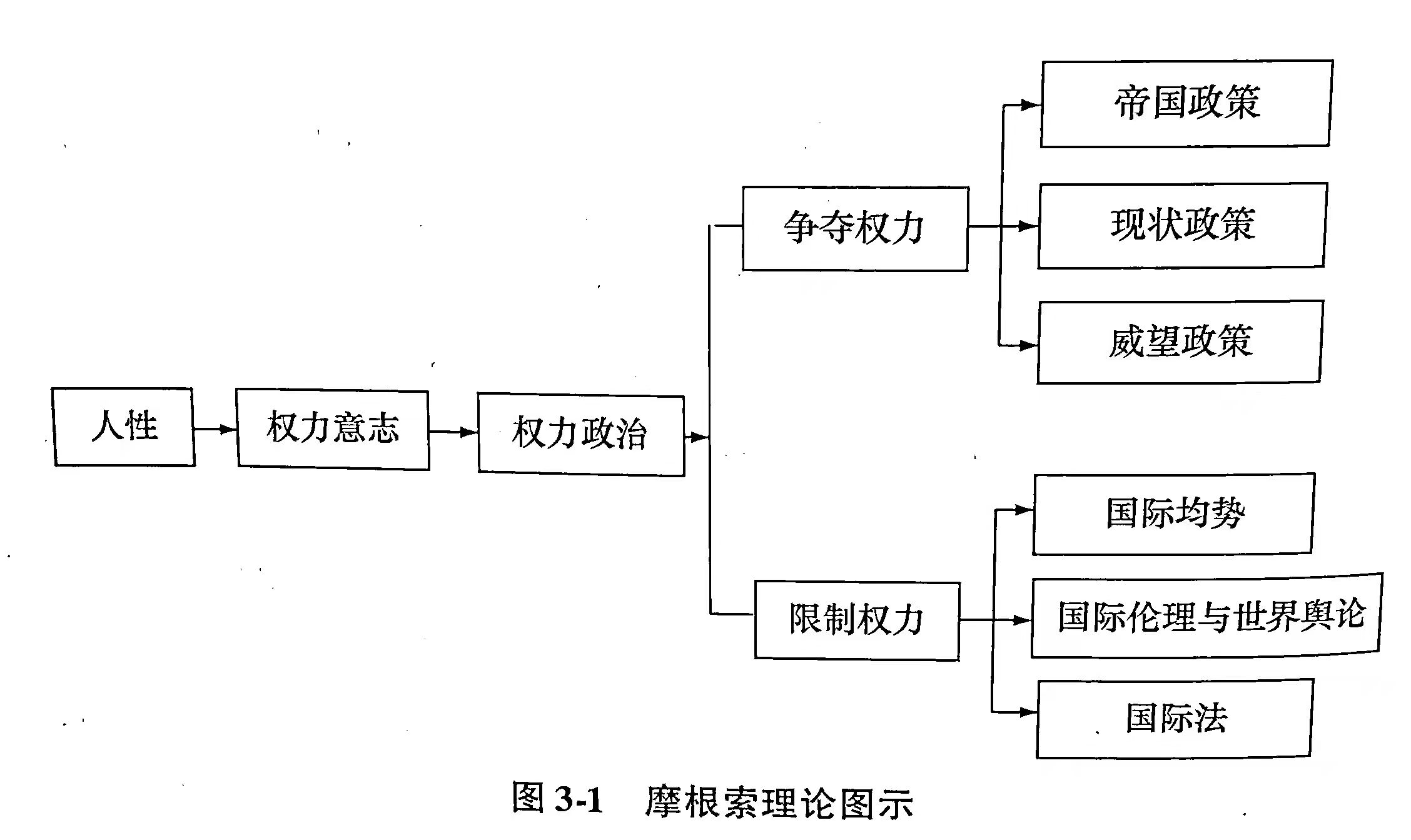
（二）汉斯·摩根索论国家行为和均势

摩根索认为，国家的对外行为可被概括为三类：维持现状的权力（保持权力、保持政策）、帝国主义的扩张权力（增加权力、增加政策）、威望显示权力（显示权力、威望政策）。

摩根索指出，“均势”既可以理解为多个力量彼此制约而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也可以指旨在寻求这种态势出现的政策；均势不是一种体系，而是落实于个体所执行的外交之上的。均势基于国家间的权力争夺，但通过建构对均势原则的国际共识带来和平。

维持均势需要巧妙的外交。在摩根索看来，在各种均势中，多极均势更为灵活。大国数量越多，可能的联盟数目就越多，联盟的不确定性就越大。而联盟的这种不可靠性使得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在国际政治的棋局上慎重举步，以尽可能减少贸然的改变带来的巨大风险，从而保证了多极均势的相对稳定。

摩根索的理论结构总体如下图所示：



（三）汉斯·摩根索论外交方略

摩根索指出了外交的四大任务：

1. 按照本国可用的实际力量和潜在力量确定对外政策目的；
2. 估计别国的对外政策目的，连同别国可用于追求这些目的的实际力量和潜在力量；
3. 确定这些不同的对外政策目的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互相兼容和共存的；
4. 运用适宜的手段来追求本国的对外政策目的：（1）说服；（2）有取有予的妥协；（3）武力威胁。

摩根索还提出了外交的四条基本规则：

1. 外交必须舍弃意识形态狂热或“征服精神（Crusading spirit）”；
2. 对外政策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和国家能力来确定；
3. 必须理解别国的国家利益，理解别国的安全需要；
4. 必须愿意在并非至关紧要的一切问题上做出妥协。

对于“妥协”，摩根索提出了实现外交妥协的五项前提条件：

1. 为获得真正的、实质性的好处而放弃空洞的、无价值的权利表象；
2. 永远不要使本国处于要么后退丧失威望、要么前进大冒风险的境地；
3. 不要让弱小的盟国左右本国的决定，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盟国的根本利益当作本国的根本利益；
4. 武装部队是对外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它的主宰；
5. 政府是公众舆论的领导，而不是公众舆论的奴隶。

四、国关理论发展的“大辩论”和“范式更替”叙事

（一）“大辩论”叙事概览

在“大辩论”叙事中，一共有四次大辩论。

第一次大辩论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大辩论，也是本讲的主要内容；这场大辩论开始于一战，结束于大概60年代。

第二次大辩论是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大辩论。行为主义强调一种科学实证的方法论，即研究人的行为模式，这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思路的；这种思路沿用到社会科学，就以量化、理论模型化和精简化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大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方法论的辩论，而不是一场理论的辩论。

第三次大辩论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大辩论。

第四次大辩论是范式之间的辩论，可以理解为各自理论在各自的范围内展开辩论。

（二）“大辩论”的价值

斯蒂芬·瓦尔特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囊括当代世界政治的所有复杂性；因此，我们最好有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而不是单一的正统理论；理论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揭示理论的优缺点，促进后续完善，同时揭示传统智慧的缺陷。

（三）反对“大辩论”叙事的理由

包括教授在内的一些观点反对“大辩论”叙事，这些观点认为：

* 第一次大辩论被过度简化；
* 第二次大辩论根本不是具体理论间的辩论（而是关于如何建构理论、建构何种理论的辨论）；
* 第三、四次大辩论叙事转向中层理论，但忽视了太多其他理论（比如国内、个人层次理论），且这也并非以范式为界的辩论。

（四）关于范式（paradigm）

1. 何为范式

范式是一个分析学派所采用的基本假定、概念以及命题之系统陈述。范式提供根本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

有观点认为：“每种研究传统都对世界政治的本质有一套独特的**核心假设**。反过来，这些假设在不同的传统中又往往不相称。它们规定了不同的分析单位（个人、团体和国家），行为者的不同利益（财富、权力和地位），甚至不同的决策过程（后果逻辑与适当性逻辑）……它们体现了对世界政治的不同看法，认为世界政治本质上是冲突性的、更多是合作性的，或者是行为者自身行动的 ‘开放’产物……这些假设界定了研究的边界，什么是 "已知 "的，什么是未知的，甚至什么问题和困惑值得一问……”

2. 反对范式的理由

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有很强的交叉性和差异性，很难说有两个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共享着一致的核心假设。范式对于现实而言难有用处，对理论而言益处也很有限。

范式还强调传承，将各类理论不断向上追溯和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对前人思想进行了简略甚至扭曲，并且也忽略了一些范式之间的重要联系。

第四讲 分析层次、世界体系与系统效应

2025.3.12

一、层次分析概述

（一）个人、国家、体系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沃尔兹在《个人、国家与战争》中区分了三个分析层次，或三种意象（image）。三种意象都从各自的方向推导出国际政治的结果（如战争）：第一意象是从人性（感知、想象、知识、心理、个性）到国际政治的结果，第二意象是从国家（制度、经济、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国内利益团体）到国际政治的结果，第三意象是从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权力配置、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国际政治文化）到国际政治的结果。沃尔兹的理论的落脚点是第三意象。

此外，与沃尔兹的“第二意象”对应地，也有观点提出了“颠倒的第二意象”，即国际政治的因素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结果。

三个分析层次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提醒了我们，每个层次上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论；在同一个层次的不同切入点上也会有不同理论。第三意象需要与第一、第二意象紧密结合起来分析实际情况；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第一或第二意象的作用。

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国家体系的结构并不会直接导致甲国攻击乙国，攻击是否发生取决于一系列特殊情况——位置、大小、力量、利益、政府类型、过去的历史和传统——其中每一个都会影响两国的行动……这些特殊原因成为战争的直接原因或有效原因。战争的直接原因包含在第一和第二意象中。

——肯尼思·沃尔兹

每个国家都在以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如何定义的。武力是实现国家外部目的的一种手段，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同类单位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而不存在一个一致、可靠的调和过程。基于这一国际关系形象的外交政策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只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一种合理回应。第三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如果没有第一和第二幅意象，就无法了解决定政策的力量：第一和第二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力量，但如果没有第三意象，就无法评估其重要性或预测其结果。

——肯尼思·沃尔兹

总之，在三个分析层次中，每个层次都对国际事件有不同的视角。虽然体系限定了可能性的范围，但是是国家与个人决定了具体的事件结果是如何的。

（二）层次分析总结

不同理论强调不同层次不同要素的影响力（也有理论以沟通层次间关系为己任），理论对不同层次强调程度和对关键变量认识的差异可能比其范式属性更明显。

同时，不同层次（行动者-结构）之间可能并非分工而是相互建构关系。这不仅事关结构对行动者的压力，也事关结构对行动者性质的塑造（利益、观念等）。

因此，本课程按照“结构-行动者-互构理论”思路来组织。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很少再按照范式来进行理论综述，而是提倡按照中层理论进行文献综述。

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主题是从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基本现实出发阐释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历史意味着地方局限性与民族特殊性被打破，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散，导致世界“同质化”。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才有世界历史的降临。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卡尔·马克思、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一）基础性假设

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的一些流派）有一些基础性假设。马克思主义将阶级作为分析单元。阶级是指在社会中具有相同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人群。经济状况决定了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也决定了人们希望担任何种职务。国家追求的是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或多个阶级的利益。国家只是国际资本主义结构的代理人和统治阶级的执行者。经济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政治和历史的动力。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等级森严、高度分层的，主要由资本主义体系主导。国际体系由生产力和财富的分配决定。

（二）帝国主义理论

1. 列宁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出，国际体系的等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的副产品。帝国主义是指一个国家通过领土征服或经济统治扩大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的政策和做法。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提出，扩张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较发达国家存在三种情况：商品和服务生产过剩；工人和下层阶级因工资低而消费不足；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储蓄过多。为了解决这三个经济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向国外扩张，激进派认为发达国家仍将扩张视为一种解决方案。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通过帝国主义进行扩张；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为了寻找新的市场；为了获得原材料；为了提高资本投资的回报率。

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地区之间为争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权而爆发战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发展中地区的控制权而爆发战争。

2. 列宁对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

列宁反对霍布森停留在现象层面对帝国主义所作的政策界定，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强调要牢牢抓住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他给出的最简洁、最通俗的帝国主义定义。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但又不敢触及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寄希望于社会改良。作为和平主义者，霍布森厌恶战争，幻想着国际帝国主义“欧洲联邦”的前景。列宁深刻指出，不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寄希望于“占有者”阶级的道德觉悟，这种“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三）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指出，一个国家的不发达不是由内生原因（即“陈旧体制的存续”“资本短缺”）造成的，而是由“过去和持续存在的不发达卫星国（satellite）与现在发达的大都市国家（metropolitan countries）之间的经济和其他关系”造成的。

（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由大都市和卫星国组成的整个星座链将整个系统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从大都市的中心……到拉丁美洲乡村最遥远的前哨。……每个卫星国……都是一种工具，从自己的卫星国中吸走资本或经济剩余，并将部分剩余输送到世界大都市，而所有卫星国都是世界大都市的卫星国。……此外，每个国家和地方大都市都起到了强加和维持这一体系的垄断结构和剥削关系的作用……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弗兰克认为，拉美国家的国内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性质造成的。只有在大都市国家对卫星国的控制减弱时（如大都市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或者卫星国本身过于闭塞孤立时，卫星国才有可能离开这一体系，获得较好的发展。当然，这个观点是有待商榷的，有观点认为在依附之中的卫星国也是能获得发展的，如中国就是一个选择融入体系但获得了发展的案例。

（四）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

世界体系论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是具有单一分工和多种文化体系的单位；如果有共同的政治制度，它就是世界帝国；如果没有，则是世界经济体。

直到十六世纪欧洲出现现代世界经济，我们才看到市场贸易的全面发展和经济主导地位。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单一的劳动分工，多重的政体和文化。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资本主义不仅涉及所有者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而且涉及核心地区对整个世界经济剩余价值的占有。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经济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事情。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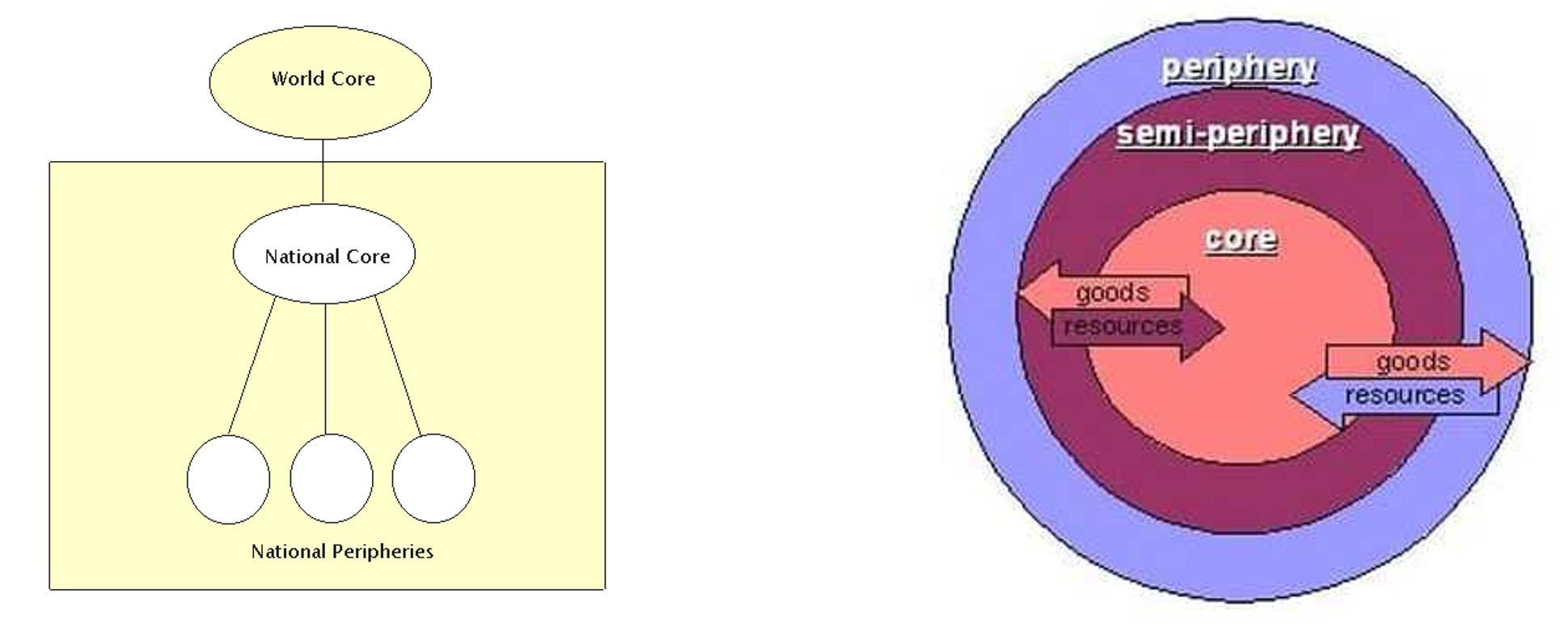
资本家向国家寻求非市场机制来增加利润。沃勒斯坦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决定了国家机器的力量。核心国家的国家得到了加强，以满足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的要求；然而，国家并不只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的反映，而是通过官僚化（韦伯概念上的）和阶级妥协，逐渐发展出一定的自主性。相反，外围国家的国家力量却在削弱，因为资本主义地主的利益在于维持开放的经济，以从贸易中获取最大利润，并消灭商业资产阶级，转而支持外来商人（他们不构成政治威胁）；他们通过战争、外交等手段进行干预，在外围制造弱国，在核心制造强国。

在世界体系的运作方面，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劳动和生产分工解释了国家之间长期存在且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它让富裕的核心国家变得更富，而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边缘国家变得更穷。这与依附论的观点基本一致。

沃勒斯坦将国家分为三类：中心、边缘、半边缘。其中，半边缘国家提供了政治稳定的因素。世界体系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是因为有三种机制：军事力量、对制度的意识形态承诺——即高层认为他们的福祉与制度的成功息息相关、半边缘国家——它基本上由核心国家收买以防其与边缘国家一起参加革命。

（五）对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的评述

总的来说，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可被分别表现为下方左右两图：



世界体系论是最彻底的体系理论。当然，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也有一些局限，如难以解释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对变化的理解机械、经济决定论等。

三、系统效应

（一）系统不同于（未必大于）部分之和

当①一组单元或元素相互连接，以至于某些元素或其关系的变化会引起系统其他部分的变化，并且②整个系统表现出不同于各部分的属性和行为时，系统就存在了。因此，从这个定义中可见，系统本身是难以预测的，并且系统是不同于且未必大于部分之和的。

（二）系统效应的概念

系统效应并不直接，有滞后性。不能说我们暂时观察不到，就说没效应。首先，除了任何行动的直接影响之外，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也会产生间接和延迟的影响。其次，任何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他们如何彼此行动，还取决于系统中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第三，系统中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相加的。行动可能不会直接导致预期的结果，因为结果还取决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反应。

因此，我们应该跳出近期、眼前的事件，做更宏观的分析。

一个特定系统的稳定性往往取决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负反馈还是正反馈。负反馈是指系统中的各要素对任何干扰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系统保持其初始状态。在国际政治中，负反馈的典型例子就是均势。对被支配的恐惧通常会导致弱国联合起来对抗强国或更具威胁性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试图积聚越来越多的力量可能会适得其反，也是为什么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对其他国家建立持久霸权的原因。正反馈则会加强干扰并扩大其影响。

如果没有负反馈，就不会有稳定，因为模式不会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也就不会有有组织的社会。没有正反馈，就不会有变化和增长。

——罗伯特·杰维斯

（三）基于系统效应的建议

以系统角度制定的政策必须从整体角度考虑。一种方法是尝试约束系统其他部分可以做什么，以便它们的响应不会破坏计划的目的。另一个选择是利用系统中的互联来间接完成自己的目标。第三种方法是制定一个更全面的策略，其中某些行动旨在实现主要目标，而另一些行动则旨在放大积极影响或弥补负面后果。

第五讲 新现实主义

2025.3.19

一、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一）追求科学的理论

新现实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构建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着重强调演绎和优雅理论的重要性。沃尔兹试图在这一理论中把复杂的东西简化、抽象化，试图用最少的变量来解释更为广泛的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又称防御性现实主义）聚焦于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因此其国际政治理论有一个主要因变量，即国际体系的战争倾向性。

（二）一个体系理论

结构定义必须将单位的特征、行为和相互作用撇在一边，或者说从它们那里抽象出来。

——肯尼思·沃尔兹

“从单位的特征抽象出来”意味着把与政治领导人、社会和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可能有的意识形态承诺有关的问题撇在一边。“从关系抽象出来”意味着把与国家间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相互作用有关的问题撇在一边。

与结构主义相对立是还原主义研究路径，因此都是不可取的。所谓还原方法，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比如，为解释某一国家的行为，从决策者的心理、国家的政治体制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就属于还原方法。

沃尔兹旨在解释反复出现的群体性、趋势性行动。尽管行为体的属性和互动方式千差万别，但是国际结果的相似性和重复性（如战争、均势）却始终存在。如果国际结果的变化直接与行为体的变化相连，那么如何解释在行为体属性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相似的国际结果却一再重现呢？因此，不能采用考察个体的还原主义研究路径。

结构现实主义主张体系结构的至高地位，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优先于行为主体（国家和个人），而古典现实主义也重视国家和人性的特点。只有将结构层面与单位层面区分开来，才能科学地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因果关系或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

（三）体系压力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沃尔兹以无政府状态为起点进行推理。无政府状态不是战争状态，而是指一个国家之上没有政府的“自助”体系，是一个战争无法从根本上被阻止的体系。当然，无政府状态不是混乱无序，其中可能出现权力等级分布。

结构现实主义不再如传统现实主义理论那样需要人性论和国家利益（power-seeking）假设，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国家目的假设（生存-安全），且这个假设也源于其对体系压力的认识。那么，一国要如何保证自己的生存-安全呢？权力。权力是相对性概念。权力是影响力，影响力是相对的，也就是位置“position”，所以关注权力的相对收益。

当然，权力是追求安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考虑到安全需要，明智的政治家只寻求“适度”的权力。一个国家在与危险的对手达成平衡，从而获得令人满意的安全程度之后，就不再需要进一步积累实力，否则反而可能招致“群起而攻之”——也就是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指的是：为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会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从而激发它们采取自己的（防御性）措施，让最初的国家感到不安全，如此循环。

结构现实主义基于上述论述的一个推论是，均势作为一种状态将不断出现。弱国为了安全建立联盟，制衡强国。这是体系压力驱使的，并非基于外交的巧妙。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己保卫自身生存（maintain position），所以每个国家都对其他国家的实力增长非常敏感，当某个国家实力迅速增强时，其他国家就有动机加速提升自己实力以平衡该国的实力。身处其中的国家要么通过内部手段，比如发展自身军事实力，要么通过外部手段，比如建立和扩大同盟。

无限制获取权力，实质上在试图改变体系。因此，根据体系的负反馈（系统论），均势实际上导致了克制行为。

（四）结构（即权力分布）的核心地位

国内政治结构的组成要素有：

1. 国内政治结构的组织原则——权力和权威的等级原则；
2. 政治单位作用和功能的区分化与专门化；
3. 政治单位间能力（权势）的分布状况。

沃尔兹的理论论点是，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和平与战争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体系结构来描述的权力分配。这里提到的体系结构，就引出了其“极和稳定”的理论。

（五）极和理论

体系结构可以分为：

* 单极（体系中的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打败所有其他国家的联合对抗；我们从未见过真正的单极局势）；
* 两极（该体系的大部分权力由两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瓜分）；
* 多极（权力由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或国家联盟瓜分，如 1914 年的欧洲）。

结构（极的数量）决定了均势获得的难易程度，也就决定了体系的稳定程度。

在多极系统中，结盟是调整权力失衡的最重要手段。正是多极系统中联盟政治的存在带来了该系统的不稳定。联盟的灵活性带来两大问题。一是联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问题。二是联盟的战略僵化问题。由于多极体系下盟国的实力彼此相近，某一国的变节将显著威胁原同盟中其他成员的安全，因此联盟的管理较之不对称同盟的管理更加困难，同盟成员的决策自由也受到限制。盟友的失败将导致同盟阵营中其他成员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其盟国只能选择随之而动，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归根到底还是极很容易变动，所以权力平衡的对象总是变。

与多极系统不同，在两极系统中，两个超级大国主要依靠自身实力而不是依靠盟国的实力来维持权力的均衡。两极体系下的同盟大都是以两个超级大国其中之一为核心成员的非对称同盟，在这种同盟中，除超级大国外其他任何成员的退出对本同盟实力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因此两个超级大国受同盟成员牵连的可能性也远小于多极体系下。后来将核武器的作用也考虑在内，作为一个稳定性的构成要素。

单极似乎是最不持久的国际格局。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在本国边界之外承担了太多任务，因此从长远来看会削弱自己。单极化持续时间短的另一个原因是，即使主导国表现得温和、克制和忍让，弱国也会担心其未来的行为。

因此，沃尔兹在这里的结论是：两极体系更稳定——在两极世界中，霸权国家依靠自身巨大的优势力量来保障安全，联盟的重要性降低，“不确定性减少，更容易进行计算”。

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设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一种体系理论，因为其推理也建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上。其假设包括：

1. 系统处于无政府状态；
2. 大国拥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3. 任何国家都无法确定他人的意图；
4. 生存是首要目标；
5. 行为者是理性的。

其1、3、4、5四点与结构现实主义接近，但其第2点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特点。

（二）国家行为

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追求“最大化其相对实力”——这一理论靠近摩根索，但摩根索的基础是人性论，而米尔斯海默的基础是体系论。米尔斯海默指出，驱动国家这么做的不是人类动物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所迫使人们对安全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是接近沃尔兹的。

米尔斯海默与沃尔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是贪得无厌的，而沃尔兹则认为这种追求是有限度的。

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结构几乎没有激励国家寻求更多的权力增长；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权力平衡。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权力，而不是增加权力。另一方面，进攻型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政治中很少出现维持现状的大国，因为国际体系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其寻找机会，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取权力，并在得不偿失的情况下加以利用。一个国家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

——约翰·米尔斯海默

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会将领土扩张作为实现安全的手段。

（三）霸权

霸权是其体系中唯一的大国。因此，如果一个体系（或地区）包含不止一个大国，就不存在霸权。全球霸权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一个国家获得了“明显的核优势”，即“有能力摧毁对手而不必担心报复”。除非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否则霸权只能是地区性的。

潜在的霸权国家总是渴望成为霸权，他们在成功之前不会停止增强自己的力量。取得霸权的国家仍不满足，它们会设法防止同级竞争者——其他霸权——在陆路可到达的附近地区崛起。当然，米尔斯海默也指出霸权的扩张是有限制性因素的：

* 大国只有在机会出现时才会尝试扩张。
* 只有当收益明显超过风险和成本时，他们才会这样做。
* 一旦受阻，他们就会停止扩张，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均势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型现实主义国家并非一直处于进攻状态。它们偶尔会面临威慑和遏制对手的情况，而对手则试图以牺牲它们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权力。在这种防守角色中，他们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

* **平衡：**采取行动维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例如，支持受到修正主义国家挑战的国家）。
* **推卸责任：**忍气吞声，不采取任何行动，目的是将抵抗的责任转嫁给盟友或其他国家。

米尔斯海默认为，选择将取决于系统结构和地理位置。有三种可能的系统结构：双极、平衡多极和不平衡多极：

在一个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中，当直接主角是陆上邻国时，最有利于平衡。在一个平衡的系统中，推卸责任将是首选策略，尤其是当防守方处于孤立状态或与挑战方保持一定距离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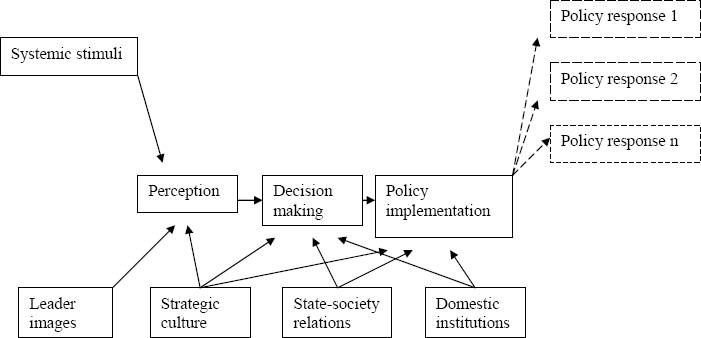
米尔斯海默指出了“水体的阻止力”，他认为，大面积的水体极大地限制了军队的力量投射能力。

总之，我们可以做两个交叉的二分：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看，米尔斯海默和华尔兹都是新现实主义者，前者是进攻性的，后者是防御性的。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

（一）理论要点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要点可以用下图表示：



从这一点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聚焦于最终的政策反应，本质上是外交政策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相同之处是，都认为一国外交政策的范围和雄心首先取决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其相对的物质力量能力。新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是，其认为这种权力能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而复杂的，因为系统压力必须通过单位层面的干预变量来转化。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政策的选择是由实际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做出的，因此重要的是他们对相对权力的看法，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或存在力量的相对数量。此外，这些领导人和精英并不总能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取和使用国家资源。这意味着总能力相当但国家结构不同的国家很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

新古典现实主义指出，系统性压力和激励可能会塑造外交政策的大轮廓和大方向，但其力度或精确度不足以决定国家行为的具体细节。

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系统首先限制了国家的选择。小国的选择是有限的，大国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不是说思想和国内政治在结构现实主义中不起作用，只是说这一体系对这些影响存在偏见。当然，国家不一定有效适应系统。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了国家何时无法适当适应制度约束，并指出了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它表明，当制度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国内政治和观念通常难辞其咎。

（二）理论应用

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被视作一群中层理论的集合体，如施维勒对制衡不足的解释、瓦尔特的威胁平衡论就是其中的中层理论。下面以这两个理论为例，说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应用。

1. 施维勒对制衡不足的解释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均势状态会反复恢复，而导致均势状态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会对实力突出的潜在霸权国实施制衡（balancing）。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面对实力迅速增长的崛起国或潜在威胁，国家并不总是会采取及时的制衡行为。

国家的制衡行为会受到四个国内因素的影响，分别是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政府/政权脆弱性。前两个变量决定了国家实施制衡的意愿，后两个变量决定了国家实施制衡的能力。

这四个变量综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国家的一致性（state coherence）。施维勒认为，在结构压力或外部威胁一定的情况下，国家一致性程度越高，即精英共识度越高、精英和社会凝聚力越强、政府/政权越稳固，越可能采取制衡行为，反之则越可能出现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的现象。

2. 瓦尔特的威胁平衡论

瓦尔特着重考虑，国家为何结盟？国家结盟可能不仅因为物质结构，而主要是因为它们认识到的威胁。一国的威胁程度取决于综合实力、地理临近性、进攻能力、意图等。

威胁平衡论的新古典的成分弱一些，但加了变量，能够解释为何反苏联盟更强。

第六讲 复合相互依赖和新自由制度主义

2025.3.19

一、从相互依赖到复合相互依赖

（一）相互依赖

1. 相互依赖的概念与特性

只要两个行为体之间发生了互相影响，就可称为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国家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平衡（不但总体，而且处于不同领域），所以相互有求；没有相互需求，则没有依赖——但实际上不可能，只要存在互动，一般就有依赖。

相互依赖的几个特性是：

* **敏感性：**敏感性指的是在保持政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A国政策的变化会在多长时间内被B国所感知到，以及会给B国带来多大的实际损失。
* **脆弱性：**一国试图改变一个相互依赖结构所需付出的成本。替代性选择越少，替代性选择的成本越高，脆弱性就越大。
* **不对称性：**可以是一种权力资源。

2.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相互依赖

不对称性主要还是看谁更脆弱，这也是现实主义认为相互依赖体现权力关系的关键点：依赖较小的一方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使得依赖较小的一方可以此相威胁，获得对依赖较大一方的权力。

沃尔兹认为，缺乏与他国的互动避免了冲突和暴力。相互依赖问题的关键是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概念，即有些国家强大，有些国家弱小。现实主义这里显然更关注脆弱性引发的不对称性导致的权力丧失问题，认为不对称的依赖必然导致不安全。

（二）对国际体系的新认识：复合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这是基于对新现实主义主要假设的修正，与简单的相互依赖不同。他们所作的修正包括：

* **假设1**
  + **现实主义：**作为整体的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国家中心论）；
  + **基欧汉&奈：**①国家不是主导行为体，国际行为体还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个人等；②国家间的交往有多层次、多渠道。
* **假设2**
  + **现实主义：**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军事安全最重要，为高政治问题；经济和社会事务次要，为低政治问题；
  + **基欧汉&奈：**许多问题与军事安全问题并列，他们之间没有固定明确的等级之分。
* **假设3**
  + **现实主义：**武力是一种可用且有效的政策工具；
  + **基欧汉&奈：**军事力量在许多问题上影响力有限。

（三）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命题

在复合式相互依赖条件下，经济制度结构、总体权力结构、问题领域权力结构、国际组织结构分别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和不同条件下，决定了国家的不同行为。

**经济进程解释模式**适用于经济议题领域。国际经济体系由政治权力建构，但国际经济活动以“非政治行为”为特性；国际经济制度会随着经济和技术变革而变化。

**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为现实主义保留了位置，局限于安全领域，与新现实主义一致，可能外溢到其他议题领域。

**问题结构解释模式**是非军事安全领域内的权力解释模式。权力的形式不是军事权力，而是其他权力资源；强国是占有特定议题领域的特定权力资源的国家。

**国际组织解释模式**强调国际联系的多层性：在国内，部门、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等都有跨国联系；在国际，更多的跨国行为体相互联系。网络、规范、制度是关键，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四）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作用机制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能促进和平，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战争机会成本。**如果双方发生战争，那么双方将不仅会丧失战争期间的经济收益，而且还需要为寻找替代性的贸易伙伴或者重新配置经济资源付出代价，这些经济损失和代价就是战争的机会成本。随着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战争的机会成本将随之增加。

**经济威慑。**依赖较小的一方可以通过诉诸有效的经济威慑，而不必通过军事威慑甚至是军事冲突，迫使依赖较大的一方让步，这样就能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同时减少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利益集团。**基于其自身利益，贸易集团、跨国集团有助于促进国家间合作。

**信息-沟通渠道。**这类似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我们会在之后提及。

总之，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国家同时追求不同的目标，而跨国行动者则追求各自独立的目标，不受国家控制。不同的问题会在政府内部和政府之间产生不同的联盟，并涉及不同程度的冲突。除军事资源外，其他权力资源（如谈判技巧）也越来越重要，权力资源往往是特定问题领域的资源。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也在增加。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假定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从假设上颠覆了现实主义，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追求假设差异最小化，然后仍然推出不同逻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假定是：

* 国际体系为无政府状态（与新现实主义一致）；
* 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与新现实主义一致）；
* 国家行为假定：理性、自利，追求安全和繁荣（与新现实主义一半类似一半不同）。

（二）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障碍

新自由制度主义核心研究的问题是：在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组织起来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合作是可能的。合作无需利益和谐。和谐是指在个体之间没有任何沟通协商的情况下，一方完全利己的行为不仅不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还会增进另一方利益的实现。因此和谐“是非政治的，沟通是没有必要的，也不需要施加影响力。相反，合作是高度政治的，行为模式必须要作出改变”。合作只有在既有利益冲突也有趋同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通过协调改变行为，实现共同获益）。新自由制度主义假定，国家追求绝对收益，即仅追求自己更加繁荣，而不追求比他国更繁荣。

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的唯一阻碍就是欺骗。国际合作的稀缺性类似于市场的失灵状态。由于国家间彼此意图的不可知，使得一国不仅在合作之初就很难确定他国合作的真实意愿。由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就将权力、安全的问题转化为了合作的问题。

（三）合作的进化

合作的进化的基础是囚徒困境。我们知道，在囚徒困境的一次博弈中，两个囚犯都不能确定对方会做什么，因此每个人都选择指证对方（缺陷），因为无论对方如何决定，每个人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在多次博弈中，互惠的可能性使得每个囚犯都有理由合作而不是叛变——如果任何一名囚犯在第一轮中指证另一名囚犯，那么在第二轮中，该囚犯可能会遭到报复；随着回合数的增加，理性的博弈者会明白他们可以通过合作实现预期利益最大化，久而久之，合作就成了他们的首选或主导策略。

除了多次博弈之外，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加强小集团的相互监督、缩小集团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当然，上述解决方案都是不正式、不稳定的。而一个正式且稳定的解决方案就是制度。

（四）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

1. 国际体制与国际制度的概念

国际体制（regime）是在某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内形成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信仰、价值和关系等方面的取向和偏好；规范是指一系列行为标准；规则是对行动的具体的禁止性规定；决策程序是指决策的方式和习惯。

国际制度（institutions）是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动并塑造预期的持久的、相互联系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基欧汉），有国际组织支撑和没有国际组织支撑（如trade regime和Law of the Sea），具有全球性、地区性、复合性。

2. 国际制度的功能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制度功能理论认为，高度的制度化大大减少了无政府状态的不稳定影响，制度弥补了国家间信任的不足，其功能有：

* 提供相对对称的信息，从而监督各国行为；
* 提供协商的机会（就囚徒困境而言，将情况从单次博弈转变为多次博弈），并创造稳定的预期；
* 产生规模经济——如果一国背叛，由于制度干预、信息扩散，其会产生比收益更大的成本；节省额外问题的边际成本——国际制度的嵌套模式通过使特定问题的联系和安排附带付款变得更容易或更困难而影响交易成本。

总之，制度之所以起作用，归根结底是靠提高国家欺骗行为的代价、减少合作的成本；也可能靠国家对声誉的追求（有争议）。

（五）国际制度的产生

有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作为交易行为的自然产物。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霸权国家主动供应的结果，而是因需求而产生的。

国际制度也可能源于霸权，但超越霸权。无论最初建立的条件如何，机构合作一旦建立，就可以存在，甚至蓬勃发展，即使这些最初的条件消失了（如霸权衰落）。

三、“新-新辩论”的焦点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所以得出了具有差异的理论，归根到底在于它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同。新-新辩论的焦点就是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之争：新现实主义强调相对收益，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绝对收益。

四、国际制度研究议程

下表简要展示了国际制度的研究议程：

|  |  |
| --- | --- |
| **主要问题** | **研究内容举例** |
| 国际合作的产生 | 辩论：是否难以实现(neo-neo debate)  分析：为什么合作有时难以实现，有时可以实现 |
| 国际制度的产生 | 功能？ 霸权？ 文化？其他？  为什么不为美国所愿？ |
| 国际制度的具体设计 | 为什么呈现不同的特征（成员、领域、集中度、控制着、灵活性等） |
| 国际制度的作用（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 国际制度与合作  国际制度与政策扩散 |
| 国际制度的变迁（制度、组织） | （再议） |
| 国际协议的遵守、有效性 | 内涵与测量 |

第七讲 理性选择与威慑

2025.4.2

一、理性选择路径的前提假设

理性选择不是一种具体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论，解释个体和集体（社会）结果是如何在约束下基于个体目标追求的。其基本假设包括：

1. 理性行为涉及功利（可能并非物质性利益，也包括荣誉等）的最大化；
2. 一致性作为理性的一部分（选项可以按价值进行排序；偏好是传递的）；
3. 决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并基于期望效用；
4. 相关的最大行为体是个人；
5. 决策、规则和偏好在时间上是稳定的，并且在不同人之间是相似的。

然而，关于理性选择路径，其内部也存在分歧：

1. 关于人类目标假设的稳健性（只需具备计算能力还是理性假设偏好）；
2. 个体通常可以被假定拥有并采取行动的相关信息量。

二、博弈论与国际关系

（一）博弈论简介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个体在相互交往中策略选择问题的理论。博弈理论的理论特征有：

1. 主要研究对象是“理性的策略选择”；
2. 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即人类经济选择完全自私、理性的假定；
3. 理论所涉及的行为体是个体行为体，也就是参与交往的个人、公司、国家等行为个体。

博弈论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

1. **参与者（player）**；
2. **策略（strategy）：**也称为策略集或策略空间。如果在一个博弈中，所有参与者都只有有限个策略，则称这个博弈为“有限博弈”，否则，就称这个博弈为“无限博弈”；
3. **顺序（order）：**如果一个博弈的所有参与者在进行决策时没有实质上的时间先后之分，则这种博弈为静态博弈。如果一个博弈的所有参与者在进行决策时存在时间先后问题，而且这种时间先后顺序对参与者的决策行为产生了实质影响，则这种博弈为动态博弈；
4. **收益（payoff）：**一场博弈结束时每个参与者的“收益是全体参与者所选择的一组策略的函数，通常称为收益函数”；
5. **均衡（equilibrium）：**博弈结果中如果存在参与者的稳定的策略组合，则这个结果存在博弈均衡；
6. **信息（information）：**主要指参与者的策略空间和特定策略组合下的具体收益，以及参与者的决策过程的具体信息等。信息是博弈活动中的关键要素，依据信息要素又分为完全完美信息博弈、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

博弈论的这六个理论要素，是我们把一个具体的硏究对象模式化为博弈分析的基本依据。我们要对一个既定的国际互动进行博弈分析，就需要首先将这一国际互动的上述博弈要素分离岀来，建立博弈分析的基本框架和模式，然后才能进行博弈分析。

（二）博弈分析

博弈分析可以采用树形图的拓展式分析，也可以采用矩阵的标准式分析。标有数值的标准式博弈矩阵，使得博弈分析的模式进一步形式化和标准化，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标准化的分析模式虽然不太直观，但其作用相当突出已成为博弈理论分析的一般形式，被广为采用。

（三）纳什均衡及其解法

所有参与者针对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的最优反应的组合，就是“纳什均衡”。只有当一个策略是最优反应策略时，它才有可能被选中。所以，我们只要选出所有参与者在所有情况下的最优反应策略那些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最优反应的策略的组合，就是纳什均衡策略组合。纳什均衡是非合作均衡，即达到最终的均衡不是参与者彼此协调和合作的结果而是完全从参与者自己的利益考虑出发进行策略决策得到的均衡结果。这样的均衡结果称为博弈的“非合作解”。

1. 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

在收益矩阵中每一个参与者的每一个策略选项对应的相对最高收益数字底部划线，划完以后，如果发现存在一组数字都被画了线，这组数字对应的策略组合就是一个纳什均衡。所谓相对最高收益数字，是指参与者的一个策略对应的所有收益中的高值，如果两个收益值并列最高，就都画出来。

但是，相对优势策略划线法只适用于仅存在一个纳什均衡的情况。对于存在多个纳什均衡的情况，我们就要运用其他方法。

2. 帕累托优势判定法

在一个博弈的所有纳什均衡中，具有帕累托优势的均衡，即参与者的收益较大的均衡，是最终的均衡解。帕累托优势判定法能够找到对所有参与者收益最优的情况，在多数情况下作为一般的多个纳什均衡的判定方法。

3. 风险优势判定法

这一方法假定：参与者是厌恶风险的，总是选择具有风险优势，即风险最小、期望收益较大的均衡。因此，期望收益较大的均衡，是最终的纳什均衡。

在“风险因素比较突出、冒险取得的收益增加又不是非常重要”的博弈结构条件下，最终的均衡解往往通过“风险优势判定法”求得。“风险优势判定法”求解就是寻找具有风险优势（期望受益最大、风险最小）的均衡解。

4. 偏离损失判定法

在帕累托优势判定法和风险优势判定法都难以进行判定时，就可以选用偏离损失判定法。这一方法假定，在两个纳什均衡中，哪一个均衡的偏离损失更大，哪一个均衡就更稳定。偏离损失最大的均衡就是最终的纳什均衡。所谓“偏离损失”，是指某个参与者偏离某个纳什均衡时给自己造成的收益降低值。

如果两个参与者从某一个均衡偏离出去造成的偏离损失的乘积大于两人从另一个均衡偏离造成的损失的乘积，那么，这个均衡就更稳定，即更可能发生。偏离造成的损失越大，偏离的激励越小，均衡就越稳定。

5. 谢林点均衡判定法

博弈本身之外的、根据我们的“常识经验”就可以知道的其它相关因素和线索，即所谓的“谢林点”，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最终的均衡解。

三、费伦和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

（一）从传统理论到谈判模型

我们知道，在传统理论中，国家之所以打仗，是因为它们在重要问题上存在冲突的利益。通常，两个国家都渴望同一块领土；战争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

詹姆斯·费伦的理论建立在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之上。他发现，虽然传统理论的假定是成立的，但战争并非总是发生。

它们（指传统理论）是不完整的：它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战争是各国为解决争端而采取的策略。在每一种情况下，冲突都至少给其中一个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给所有当事国都造成了损失。

鉴于这些严重后果，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所有参与方都能达成解决办法，避免战争的代价，他们是否会过得更好。

——詹姆斯·费伦

要了解战争发生的原因，我们就必须找出有时阻碍国家通过和平协议解决冲突的因素，从而避免战争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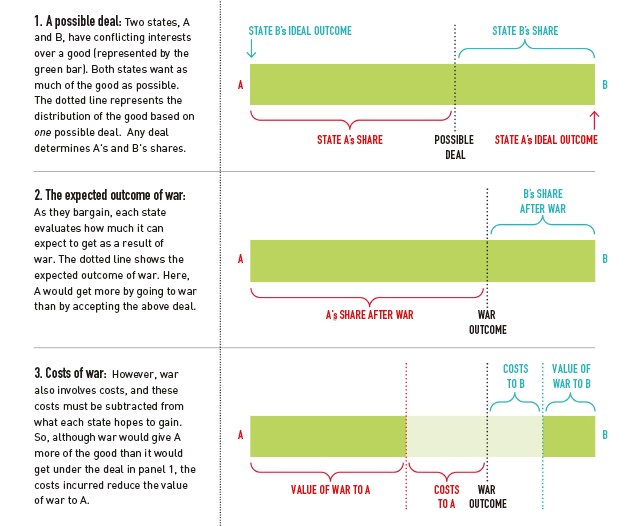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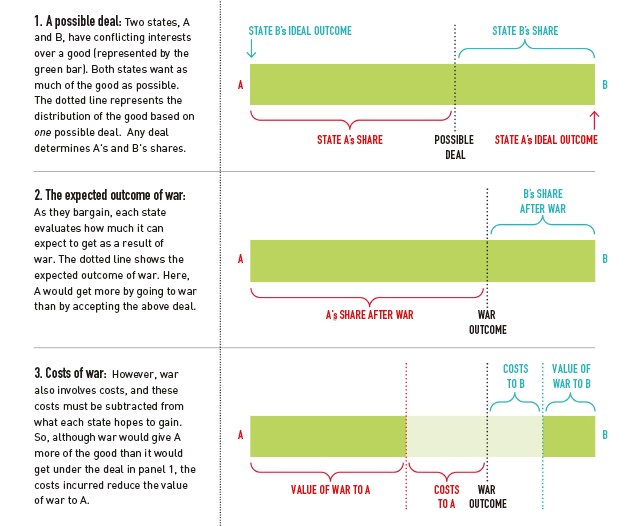
（二）谈判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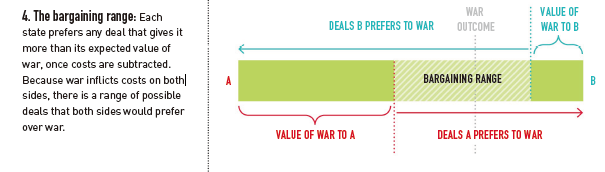
讨价还价描述了参与者试图解决关于资源分配争端的互动。战争的成本和可能结果决定了每一方在危机谈判中会考虑哪些交易是可接受的。我们通常可以假设，在危机中，一个国家的最佳结果是获得整个资源而不必打仗。如果对方让步，国家就能获得其最偏好的解决方案，并避免支付与战争相关的成本。然而，国家也很可能接受低于其最偏好解决方案的结果，因为打仗的替代方案是昂贵的。

这一理论与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认识到使用军事力量会给国家带来成本，因此即使威胁使用武力有助于获得更好的交易，国家通常还是更希望不必实际使用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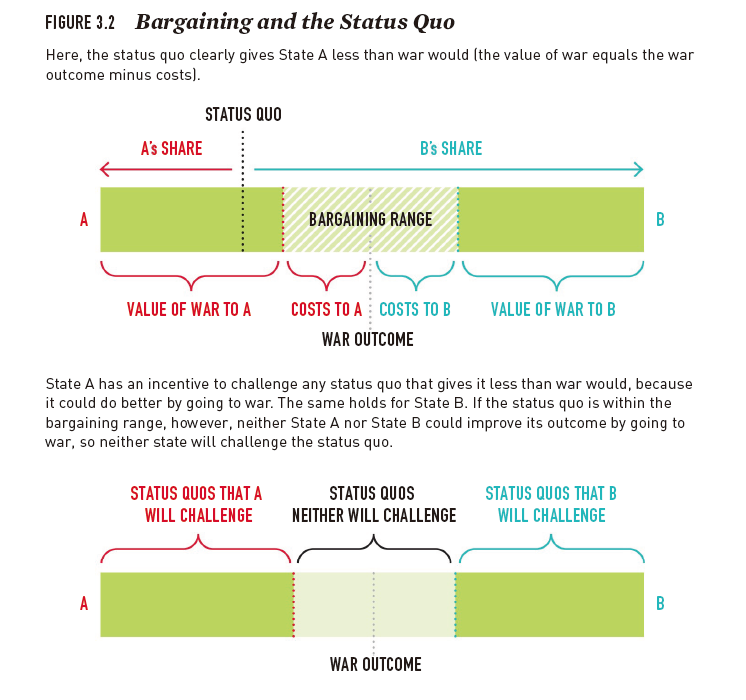
要了解成本如何影响每个国家的战争价值，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成本与商品价值的关系。例如，为了争夺一块价值 1 亿美元的领土而发生冲突；然而，如果用金钱来衡量，战争成本将达到30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参战的预期价值为1亿美元-3000万美元=7000万美元。因此，国家应该愿意接受任何至少价值 7000 万美元或更少的领土交易。

下面，我们来看费伦提出的谈判模型：





下面是一个运用此模型分析国家面对维持现状或打破现状（战争）时的行为的案例：



（三）谈判失败的情况

1. 信息问题

信息有可能是不完整的。当各国对彼此发动战争的**决心**和**能力**的信息不充分、不完整时，一个国家在面对各种要求时，可能会错误地让步过少或根本不让步；国家可能会提出过高要求，误以为对方会屈服。**能力**是指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实际能力。**决心**是指一个国家承担战争成本的意愿，以及相对于这些成本，国家对争端对象的重视程度。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不撤军，以为自己能够打赢美国，且认为美国承受不了巨大伤亡；但美国也认为自己能打赢伊拉克，且可以伤亡小。

信息也可能被扭曲。既然不完整的信息会导致战争，为什么各国不能简单地告诉对方自己的能力和决心，从而避免战争呢？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激励意味着国家会隐瞒其真实实力的信息；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为了掩盖自己最薄弱的底牌而进行虚假陈述。在某些情况下，泄露信息可能会削弱国家在战争中获胜的能力，从而产生不泄露甚至歪曲信息的动机。各国也可能有动机虚张声势，发出战斗成本低于实际成本的信号，以获得更好的交易。

2. 承诺问题

承诺问题类似于博弈论中关于合作与背叛的问题。我们知道，本轮谈判中一方的得利可能成为其下一轮谈判的资本，使另一方陷入不利地位。如果各国不信任彼此在未来遵守该协议，会发生什么？那么，各国就会就未来谈判权力来源的商品进行讨价还价。

当首次发动攻击有显著好处时，就存在先发优势。当军事技术、战略和（或）地理位置使进攻行动相对于防御行动具有优势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了攻占领土，进攻方在军事力量上所必需的投入相对于防御方的军事投入的比率。即当防御方在军事上投入X，进攻方在军事上投入Y，那么，Y 必须要有多大，进攻方才能够攻占防御方的领土? **攻防平衡**就是 Y/X；这个比率越大，则意味着攻防平衡越有利于防御。

——查尔斯·格拉泽、凯姆·考夫曼

3. 不可分割问题

有一些利益是无法被分割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采取了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谈判立场，谈判模型也就难以成立。例如，当布什在2001年10月要求阿富汗政府交出应对911恐怖袭击负责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时，他宣称“这些要求不容谈判或讨论”。

四、威慑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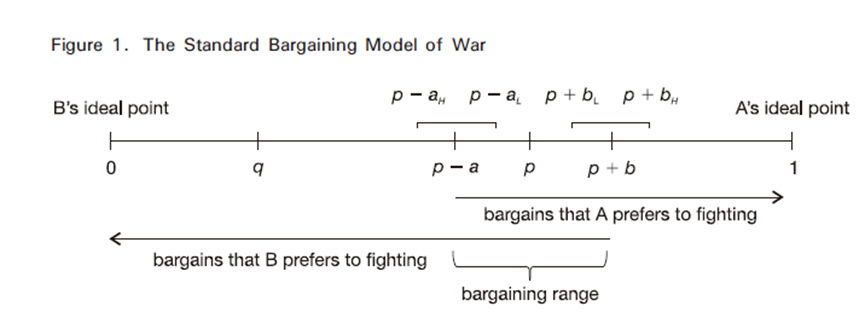
（一）威慑的定义

威慑是用来维持现状的，方法是威胁对方如果试图改变当前的关系，就要付出不可接受的代价。威慑的标准形式是“不要做某事*x*，否则就会怎样”。

威慑有两种类型：遏制对本国攻击的努力被称为**总体威慑**，是各国经常参与的活动；威慑的另一种形式发生在一个国家试图保护朋友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威慑信息的形式是“不要攻击我的盟友*x*，否则就会怎样”，这种威胁一般被称为**延伸威慑**。

（二）威慑成功的条件

威慑成功的条件包括：能力、信用、沟通。我们还是以费伦的模型为例：



威慑就是要让对方明白，*p*点对己方有利，己方能承受的代价多，对方能承受代价少——使对方相信，*p*-*a*小于*q*。

可信的威胁是目标认为会实施的威胁。请注意，威胁的可信度指的是目标的信念，而不是发出威胁的国家的实际意图。

（三）建构可信性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威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建构可信性。威胁要想可信，就必须代价高昂，使发出威胁者只有在真正打算实施威胁时才会发出威胁。危机通常表现为外交交锋、威胁与反威胁、部队动员、军队调动和武器部署。这些行动都有其政治目的：它们是强制外交的语言，是各国用来说服对方愿意以武力威胁支持其谈判立场的词汇。

建构可信性的具体形式包括：

* **边缘政策（brinksmanship）：**增加意外战争的风险，希望对方首先“眨眼”（失去勇气）并做出让步；
* **捆绑双手：**威慑信号的发出具有较高的成本，以使得退缩变得困难的方式进行威胁；
* **为权力支付：**采取昂贵的措施来增强他们的能力，例如动员和部署大量军队、增加军事人力和/或花费大量资金。

第八讲 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

2025.4.2

一、国内-国际路径综述

传统理论，如理性选择理论，基本上不讨论利益的形成问题，而是假定某种利益。但是，国家利益可不可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国内的各种利益的集合体呢？

（一）阿利森与《决策的本质》

阿利森在《决策的本质》中提出了三种行为模式：

* **模式一——理性行为者：**该模式认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是追求效用的，他们会做出理性的决策，对利益和成本进行计算和权衡，正如博弈论中对事件的描述——有目的、有目标的活动。
* **模式二——组织行为：**行为主体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国家或政府，而是一个由松散的联盟组织组成的星座，政府领导人坐在上面。组织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为完成单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创造能力；它们通过现有的计划和例行程序约束行为；它们通过组织文化塑造个人行为；它们与个人的相似性低于与技术或技术组合的相似性。

模式二与模式一的根本区别还在于，“官僚们会生产更多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并寻求更多的资源来完成这些工作，而这可能超出了社会的真正需要或承受能力”。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将行动建立在对未来的估计之上，而且经常“表现出与纯粹的功能解释不一致的行为”。

* **模型三——政府政治：**模型三将政府行为视为层级位置的领导者之间反复讨价还价游戏的结果，这些领导者“坐在组织的顶端”并且“对必须做什么存在分歧”。

模型三与模型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国家视为由多个参与者组成，这些参与者并不做出统一的、理性的决策或专注于单一问题，而是围绕多个国内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行动时没有一致的战略目标，并通过“政治的拉锯战”做出政府决策，这往往基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国内政治利益、组织利益或与其职位要求独特相关的利益。

（二）国内-国际路径的共同基础

国内-国际路径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外交政策的选择源于国内行为体的互动，这些行为体在决定利益如何聚合、联盟如何形成的体制内运作。

这些解释中的主要行为体不是国家，而是政府——即对国家外交政策拥有控制权的个人或团体，他们被称为领导者、执政者或行政官员。

这里讨论的所有理论都强调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但并不一定代表国家，而民众则是政府实施政策和继续掌权所依赖的对象。

这一路径还强调了国内机构的重要性，这些机构决定了哪些国内行为体对政府具有影响力，以及领导层是否以及如何对外交政策的选择和结果负责。

（三）国内-国际路径的分歧

国内-国际路径也在两个维度上存在分歧：

* **维度一：**领导者在设定议程或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自由度。一方面，有些理论认为领导者是在国内行为者的要求下运作，这些行为者对国际结果有偏好，并且能够确保领导者执行这些偏好。

另一方面，有些理论根植于委托-代理逻辑，认为对领导者的控制更为复杂，因为领导者在信息和组织方面具有优势。在这些模型中，领导者最多是事后负责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实施自己喜欢的政策，但交付被认为不可接受的结果（例如，输掉战争）会有成本，而交付被认为可取的结果（例如，和平与繁荣）会有奖励。

* **维度二：**强调国内利益的理论与强调国内制度的理论。

二、国内利益集团与国家行为

各国在国际利益和雄心方面，以及这些利益和雄心将它们带入与他国竞争的程度方面，都差异显著。这是国内-国际路径与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不同点，在我们展开下面的讨论之前，必须先接受这个前提。

（一）早期的国内利益集团与国家行为讨论

有关国内利益集团与国家行为的关系，霍布森是较早进行讨论的。他指出，帝国政策受制于金融利益集团，他们在国内拥有的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殖民地带来了许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追求荣誉和更多预算的领导人与追求利润的军火制造商结成联盟。他认为，首先，在国际层面追求的利益反映了国内各集团的利益；其次，最重要的利益是相对较小的有组织团体的经济利益；对小团体的关注源于对集体行动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大众舆论的不屑一顾。

在这之后，也有了一些简单的经济-政治推论，例如：

* 一个从与某国的贸易中受益的行为者将推动促进与该国稳定关系的政策，例如军事联盟或促进冲突解决的机构。
* 一个因与某国的贸易而受到伤害的行为者将推动保护主义政策，以牺牲双边安全关系为代价。
* 一个在外国进行投资或贷款的行为者将寻求确保这些投资的回报或贷款的偿还的政策（合作、援助、干预）。
* 在军事工业复合体中，有一些行为者可以在国家面临威胁的安全环境和/或追求扩张主义外交政策时受益。军事、国防工业和政治家之间的潜在关系是文献中所谓“铁三角”的一个特殊案例，涉及利益集团对机构的捕获。

（二）利益集团影响国家行为的推论

1. 资源禀赋论

一个在贸易方面推出的比较复杂的推论，就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这一理论指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各国产品价格上的差异。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在于生产要素赋予条件的差异。

由于各国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或称资源禀赋）是不同的，即丰裕程度存在差异。

一国拥有量较为丰裕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必然较低。因而密集使用这一丰裕要素的产品的相对成本必然也比较低，而一国拥有量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就必然比较高，从而密集使用这一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的相对成本也就必然较高。

一国资源禀赋的特点，决定该国最适宜生产的商品种类，如资本要素丰盛的国家，则适宜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要素相对丰富的国家则适宜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就能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因此，从保护主义政策中受损的是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与要素丰裕部门（出口部门），收益的则是要素稀缺部门（受到进口压力的部门）。

2. 政治方面的推论

斯奈德试图通过说明扩张主义政策如何使这些国家内部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受益来解释大国的过度扩张。例如，在帝国德国，领导人依靠的是“铁与黑麦”的联盟：工业家和海军将领从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中获益，而农业利益集团则希望得到俄国小麦的保护。为了迎合这些行为体，德国推行了对英国和俄国有害或具有威胁性的政策，引发了“包围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虽然所有大国都有受益于扩张主义政策的集团，但卡特尔、民主和极权制度在陷入过度扩张病态的程度上是不同的。

三、民主和平论

（一）民主和平论的概念

1. 民主和平论的基础

民主和平论的基础是一系列所谓的“实证”证据。研究发现，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战争，即所谓的“民主和平”。我们之所以说“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因为一些研究表明，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并不符合这一总体模式。

虽然民主国家很少（如果有的话）与其他民主国家交战，但它们的总体参战率与非民主国家大致相同。这意味着，虽然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但它们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却更为频繁。

2. 民主的定义

什么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呢？根据民主和平论，民主的定义是：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候选人通过频繁、公正的选举竞争政治职位，成年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投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主”指的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不是简单的民主，自由民主国家不仅通过民主方式选择领导人，还通过赋予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来对当选政府的行为施加限制。

在一些国家，领导人通过世袭或军事政变获得职位；在其他国家，选举中的竞争被禁止；还有一些国家可能在多个政党之间举行选举，但限制竞争，使得执政党几乎肯定会获胜。这些国家就都是非民主国家。

（二）民主导向和平的机制

1. 制度增加战争成本

民主政府被认为在战争中面临更高的成本，因为它们的政治系统赋予了一个在非民主政体中几乎没有发言权的集体行为者：大众。

一方面，人们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共同参与决定是否战争。这个问题将被公开辩论，成本和收益将被权衡，国家只有在人民给予同意后才会承诺战争。通过这种方式，发动战争的决定将谨慎作出。

另一方面，即使选民无法事先否决战争，他们也可能在战争进展不顺利的情况下对领导人施加政治成本。在这种观点下，民主制度为选民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机制，以便在决定发动战争时，领导人必须考虑到被罢免的风险。

2. 制度增加信息可获得性

民主国家发出的信号代价更高。这种方法强调国内受众在惩罚退缩领导人方面的作用。费伦假定，如果政府在危机中退缩，政治对手就会试图利用外交政策的失败来玷污国家荣誉。

通过自由媒体和公开辩论，民主制度为外国观察员提供了大量信息。民主的关键属性是反对党能够自由、公开地宣布对使用武力的立场，而来自两党的信号所透露的信息要比政府单独透露的信息多得多。

3. 民主改变政治文化

民主与一系列旨在促进妥协和以非暴力方式解决政治争端的制度有关。

民主国家内部的冲突解决规范是通过妥协的方法和平解决争端。这既表现在各政党或政治家为权力而进行的和平竞争，也表现在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民主国家会将这种“受约束的政治竞争、妥协解决政治冲突以及和平移交权力”的规范外化。

相反，如果面对的是非民主国家，由于“非民主国家对自己的人民都处于一种侵略状态，它们的外交行为也就很难为民主国家政府所信任”，所以当与非民主国家发生冲突时，它不会期待对方会受到民主规范的约束，而认为有必要按照后者的暴力解决冲突规范来行事，以防止自身妥协的倾向被对方所利用。

四、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

（一）帕特南的“双层博弈”

帕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当各国政府就合作条款进行谈判时，它们同时在国际和国内层面进行博弈。在国际层面，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找到一个两国都能接受的协议；在国内层面，面临的挑战是找到一个既能为国内选民所接受，又能为必须批准条约或通过立法实施条约条款的立法者所接受的协议。

由于需要国内批准，在国际层面可以达成的交易通常会减少，因为这实际上增加了否决者。受国内制约的领导人可以利用他们的制约因素来达成更有利的协议。有三个因素对决定赢面大小非常重要：二级偏好和联盟、二级机构和一级谈判者的策略。

帕特南提出了“获胜集合”，即在国际国内两层都通过合作条款的情况的集合。由此就产生了两个推论：

* **第一个推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大的获胜集合使得第一层次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大。
* **第二个推论：**谈判者在第二层次的获胜集合越大，则具有较大获胜集合的谈判者更加可能受到第一层次上其他谈判者的挑战。与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第二层次上的获胜集合较小，则它可能在第一层次上具有谈判的优势。

（二）合作与遵约

我们知道，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如果不遵约，就会受到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与惩罚。国内-国际政治路径也关注遵约问题——对国内选民的回应会改变政府遵守协议的动机，领导人的不遵约可能导致国内对其的惩罚，国内有限的决策灵活性也使国家不易返回，国内政治运行的透明度也给遵约提供了信息与确定预期。

不过，国内行为者的要求也可能会增加遵守的难度，如当经济冲击导致衰退行业呼吁保护主义时。

第九讲 国际政治心理学

2025.4.16

在分析心理时，存在两个分析路径，每个路径下又有诸多分析变量。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变量包括人性、本能（攻击、恐惧、侵略）、精神分析等；认知心理路径的分析变量包括信息处理与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和信念体系、社会学习等。

一、早期论说：弗洛伊德论战争的原因

人性在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理解范式中得到进一步“科学化”的说明，他指出了战争（好战）的种子在生物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由来。他指出，人有两种本能：

1. 寻求自我保全和亲和（united）的本能，即以性本能为基础的“爱欲”。爱欲本能的目标在于不断地建立更大的统一体，并极力地维护它们。
2. 寻求摧毁和杀害的本能，可统称为进攻或毁灭的本能。就破坏本能来说，我们可以设想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勃勃生机变成无机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死的本能。

当死亡本能借助某些器官把他的行为向外对准外部对象时，它就变成破坏性冲动。人类往往有将自己死亡的本能向外界释放的冲动，正如杀人狂在杀人以后会释放内心压力获取满足，这种丑陋现象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生的本能和死亡的本能也同时起作用，生物通过毁灭身外的物体而到达自我的生存。当人类爱欲的本能导向某一客观物体时，人类便同时需要控制的本能（毁灭的本能）来占有那个物体。

弗洛伊德的这些论说具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功能。在弗洛伊德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的原因；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消灭人的战争的本能。

二、认知偏差对理性选择的限制

尽管认知心理学没有提供统一的选择理论，但它解释了人们为何偏离理想的理性选择，并提醒国际政治分析者注意领导者可能使用的一系列系统化简化策略。杰维斯认为：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

（一）认知偏差产生的机制

领导人之所以会产生错误知觉，主要有两种原因，即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决策者本身的心理因素。从外在环境来看，在危机决策中，时间紧迫，需要及时做出决断，同时决策者信息掌握得并不是很充分；从内在心理因素来看，决策者本身的认知能力、情感状态和动机以及人格等都影响错误知觉的产生。

错误知觉的几种来源包括：



其中，除了最后一个“文化差异”外，基本都为认知偏差的情况。

杰维斯列举了三种国际政治中的认知偏差：

1. **历史包袱：**当政治领导人从过去了解未来时，他们倾向于不附加条件地进行简单的一对一类比。
2. **认知相符：**认知心理学证明，人们先前的信念会对信息处理产生强烈影响。面对不一致的信息，人们会努力保持“信念系统”的一致性。
3. **诱发定式：**人们在对新信息进行判断时，受到当时正在处理和考虑的问题的影响。

（二）一些典型认知偏差

杰维斯还列举了以下典型认知偏差：

1. **自我中心偏差：**过于依赖自己的感知，而不是对现实的感知。人们总是在进行原因推断，如果出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情境，那么认为是自己政策和行为所致，而对于不利的情形，则可能归结为外在的原因。另一种情况是，认为自己好意，别人恶意。
2. **统一性知觉：**我们往往认为对手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成的。统一性直觉往往导致了各种阴谋论。
3. **愿望思维：**避开自己不愿听到的信息。
4. **认知失调：**处理矛盾信息时趋向寻找借口自圆其说。

（三）捷径/启发（heuristics）

人们倾向于用自己最容易记住的东西来解释模棱两可的信息，因而往往会依据所描述的特征去给被观察事物进行分类，而忽视了样本容量的大小和先验概率的大小；又或者，人们常常基于（过去经验的）相似性来预测（当前事件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就是捷径。

捷径有锚定效应，即夸大某一事件与先前某类事件之间的相似性，并通过将其与“可用的”初始值（通常是不准确的初始值）作为参考点进行比较，从而估计出事件的大小或程度，并进行比较。

（四）个人特质与认知偏差

有学者将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分为“刺猬”与“狐狸”：刺猬们对“一件大事”了如指掌，并能将自己的知识延伸到外交政策分析的其他领域。在外交政策分析中，刺猬在面对证据时往往是演绎型的通才，而狐狸则可能是归纳型的实用主义者，更倾向于寻找新信息，对新信息持更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狐狸知道很多细小的事情，通常对宏大的总体计划持怀疑态度，用不同的知识线索拼接解释，并对世界政治的预测持怀疑态度。当身为狐狸的领导人身负政治责任时，外交政策很可能会适应新的信息，而刺猬则更有可能推动政策朝着一致的方向发展。

（五）危机和压力

面对危机和压力时，个人可能会遭遇：

1. **注意力持续时间减少：**信息量增加而时间减少，这将导致决策者缩小关注的线索数量，希望过滤掉无关信息。
2. **认知僵化：**焦虑和压力降低了对模糊性的容忍度，决策者建立了一个主导的认知框架，通过该框架过滤信息。
3. **时间观念：**截止日期增加压力，但压力的增加强化了时间的显著性并扭曲了对时间的判断。人们会高估时间流逝的速度。信息搜索可能变得效率低下且过于简化，政策选项减少。

此时，人们也倾向于免除自身责任，未意识到对方也面临类似的限制。更可能依赖情绪、信念和期望，而不是适当处理新信息。

三、前景理论与决策

（一）前景理论的基本命题

前景理论的基本命题包括：

1. **确定效应：**在确定的好处（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做一个抉择，人会选择确定的好处。
2. **反射效应：**在确定的坏处（损失）和“赌一把”之间，做一个抉择，多数 人会选择“赌一把”。
3. **损失规避：**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更为敏感。“捡到100元的快乐，不敌丢失100元的痛苦。”
4. **参照依赖：**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由参照点决定。

前景理论认为，选择受决策问题框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可以通过可用选项的顺序和呈现方式来操纵，而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行为体追求的既不是权力最大化，也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幸福感，是心理上的满足。

（二）前景理论与领导人决策

外交政策决策者与大多数人一样，通常不会对风险持中立态度，他们往往厌恶损失。当事情进展顺利时，领导者往往会规避风险；与增加收益相比，领导者可能会冒更大的风险来保护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这被称为“禀赋效应”。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当领导者面临危机，有可能失去或已经失去对他们很重要的东西时，他们往往会相对接受风险；他们可能会冒更大的风险来挽回损失，夺回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赚取新的收益。该理论将冒险倾向归因于形势的属性，而非领导者个人的特点。

我们在获得收益后相对较快地“重新规范”我们的参考点——但在遭受损失后则不会——以反映“新的”现状。这种情况导致了：

* **让步厌恶：**双边谈判中的各方将自己的让步视为损失，将对方的提议视为收益，因此高估了自己所拥有的相对于通过谈判可能获得的东西，并增加了他们冒着不达成协议后果的意愿。
* **“沉没成本”：**在没有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这些被视为确定的损失，而努力挽回这些损失（即确保牺牲不是徒劳的）可能导致在无法取胜的战争中“陷入困境”。

（三）前景理论与领导人决策

前景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应用如：埃及总统萨达特从未因1967年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而“重新规范”。尽管以色列在军事能力上明显占优，萨达特毫不气馁，并且高度激励自己收复西奈，他无视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于1973年发动了战争。

如果以现状（或以上）为参照点，面对实力下降而无所作为将导致一定的损失，因此，为避免这种损失而做出的努力（在仍有可能的情况下制衡崛起的对手）被认为值得冒险。由此，如果对手挑战现状的动机在于追求收益，我们则使用传统的军事（加政治）威慑的手段，这样就能达到制止对手行为的目的；如果对手挑战现状的动机在于防止损失，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保证的措施，这样可以让对手放心，从而不会冒险。

四、情绪和决策

认知心理学家和前景理论学家尽管对（微观经济）理性模型进行了循证批判，但与效用最大化理性的基本假设仅有一步之遥。他们继续将理性设定为默认值，然后探讨系统性“错误”和“偏差”“受限”或有界“理性”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从情绪而非理性出发，就会来到另一个视角。

情绪是对某种弥散性生理变化的主观体验，而感觉则是对自己正在经历某种情绪的自觉意识。信念是一个人认为可能为真的命题或命题集合；信念的前提是不确定性。相比之下，知识是无风险的、非个人的、恒定的。

（一）情绪、认知与决策

五种基本情绪是愤怒、伤心、快乐、恐惧、厌恶。

许多决定似乎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情绪——下意识的神经过程。与传统智慧相反，我们通常是先感觉后思考，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往往是先行动后思考。情感是首要的，在选择中起着主导作用。理性和情感是相互依存的。人们相信自己的即时情绪反应，只是在事后通过相对费力的认知过程来纠正它们。

情感信念对决策有强烈影响。首先，情感是一种同化机制，影响证据的选择和解释。与情感不符的证据可能导致寻找更多证据，但也可能导致忽视这些不符的证据。其次，明智的战略选择依赖于体验情感的能力。无法体验情感（从而无法想象他人的情感），或认为情感仅仅是非理性的来源，会削弱一个人的分析能力。第三，情感具有效用，这意味着人们关心过程也关心结果（即以尊严和尊重对待他人会影响他们对某一结果的信念）。对我来说，重要的、我重视的是情感和认知的过程——我是否被公平对待既是情感的判断，也是认知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具有效用。

（二）情绪与威慑

行为者对他人可信度的评估取决于对证据的选择（和解释）以及对风险的计算。信任或不信任、喜欢或不喜欢、赞同或不赞同、爱或恨、自豪或屈辱等情绪影响着对证据的选择和解释，并在可信度评估中有所体现。发现偏好依赖于参照物是令人震惊的。这意味着对风险的态度取决于感觉，而不是选择的客观属性。人们通常认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风险大，喜欢的东西风险小。

恐惧引发不确定性和规避风险的行动，愤怒和屈辱会让人产生确定性并接受风险。

五、团体心理学与团体决策/行为

群体可能倾向于“简单从众”，即集体讨论旨在最小化差异，以构建共享的表征/无差别的分析（即群体团结）。这种集体决策尤其可能在威胁和压力下发生。然而，当领导者积极促进辩论和差异化时，审议和争论通常会蓬勃发展。

集体情感是怎样产生的？首先，基本情感从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类似于其他需要物理接近的传染过程。其次，情感通过社会评价过程传播。第三，当个体强烈认同某个群体时，会体验到群际情感。第四，社区有情感。集体情感构成了感觉和情绪，这些情绪可以成为全球政治中选择和行动的强大推动力，也可能导致恐慌和撤退。